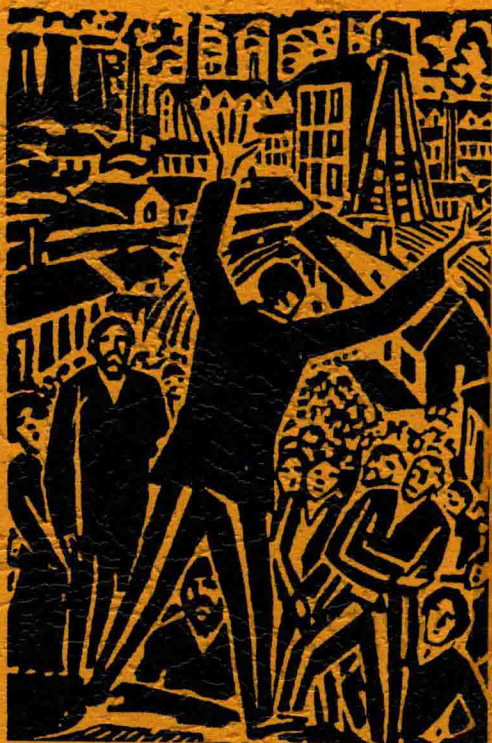


韜奮宣言論集

韜 奮 著



韋奮田三論集

韋 奮 著



韜 奮 言 論 集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著作者 韜 奮

發行者 大華書店

經售者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韜奮言論集

韜奮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韜奮言論集目錄

一 言論

- 援助綏遠前綫將士……………一
- 生死關頭的華北……………五
- 中蘇友誼與遠東和平……………九
- 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一三
- 國防前綫的華北……………一七
- 就寯避虛的侵略……………二一
- 在歧途上的中國……………二五
- 外交的途徑……………二九
- 現代國家與民衆運動……………三五

中國的立場·····	四一
沈痛的回顧與光明的展望·····	四七
侵略與和平·····	五三
回到了學校·····	五九
二 漫 筆	
世界的中國人·····	六五
事實上的三權·····	七三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七八
真理·····	八二
個人的美德·····	八六
事實的表現·····	八九
大眾的軍人·····	九二

矛盾和一致	九六
糟塌	九九
領導權	一〇二
社會的成份	一〇五
羣	一〇八
躲	一一一
我們的	一一四
柴納門	一一七
有閒	一二〇
家醜	一二三
走狗	一二六
每季	一二九

三 筆 談

艱苦奮鬥·····	一三三
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綫·····	一三六
救國聯合戰綫的誤解·····	一三九
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	一四二
褊狹態度和動的現實·····	一四五
救國聯合陣綫的出發點·····	一四八
聯合陣綫與漢奸問題·····	一五一
今年的八一·····	一五四
聯合陣綫和黨派立場·····	一五七
相信我們自己·····	一六一
分頭努力·····	一六四
四 附 錄	
在香港的經歷·····	一六七

援助綏遠前綫將士

綏遠前綫將士已開始爲國血戰了！我們全國的同胞應該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

自綏遠戰事爆發以來，最可興奮的是全國各方的同仇敵愾，紛紛發起援助綏遠前綫將士的廣大運動，一致踴躍輸將，各處學校多實行絕食一天，集款慰軍，上海三十餘團體電慰矢志報國的傅作義主席和誓死守土的前方將士，並電請中央迅派大軍協勦，乃至首都「天主教堂同人」也將一日的教士的生活費和員工薪金匯往歸綏公醫院救護隊應用。這是全國聯合陣線的端倪，是每一個救國同胞看了都要歡欣鼓舞喜出眼淚來的良好的現象！我們要積極擴大這個救國抗敵的聯合陣綫！我們要積極提倡並努力實行「一日貢獻」來援助正

在前線英勇抗戰的將士！

誰都知道，這不是什麼『匪僞』。攻綏遠，實在是整個侵略國來攻綏遠；倘若讓一省抗戰一國，那是我們陷害爲國守土的將士！誰也都知道，敵人不是僅僅攻一省，實在是更進一步淪亡整個中國的步驟；倘若我們只是立於旁觀的援助地位，不深刻地認識我們不僅是援助綏遠，實在是拯救整個中國的淪亡，那也是很大的錯誤！

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從種種方面努力援助綏遠前線將士，固然是所謂義不容辭，但是同時還要努力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必須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綏遠前線將士的血戰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二

這次攻綏的敵軍雖號稱『匪僞』，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已派飛機督戰，投彈轟炸，駕駛員與機關槍手，都由日人充任，這明明是侵略國明目張膽壓迫『匪僞』來殘殺中國人，我們絕對不能掩耳盜鈴，認爲是本國土匪的問題。據我們所得的東北傳來的確息，所謂『匪僞』不

過受我們民族敵人的壓迫，倘中國果然發動整個的抗戰，他們都仍要反過來幫助中國的。所以以在這樣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我們立於國民的地位，要竭誠要求政府第一件事是動員全國抗敵救亡！

我們的民族敵人已在綏遠發動軍事的殘酷侵略，而在綏遠不遠的區域，還繼續着中國人殘殺中國人的內戰，這是很痛心的事情！我們主張凡是有決心共同參加抗敵救國的都聯合起來一致對外，不要再消耗中國的力量來殘殺中國人，應增強中國所有的力量來對付我們的民族敵人。毅然停止一切內戰，這是我們立於國民的地位，要竭誠向政府要求的第二件事。

敵人已在軍事上用飛機大炮壓迫『匪偽』侵略中國的領土，殘殺中國的人民，蹂躪中國的主權，而同時還進行着所謂『外交談判』，這實在是天地間最不可思議的可痛心的現象！我們主張政府應對日本提出強硬的抗議，限制在日本威脅下的『匪偽』於廿四小時內退出綏察，否則立即公布停止交涉，乃至絕交。這是我們立於國民的地位，要竭誠向政府要求

的第三件事

我們覺得政府對這三件事能毅然實行，便是政府下決心和全國民衆共同抗敵的事實上的表現，必能獲得全國民衆的一致的精誠擁護。我們決不可聽任綏遠的抗戰再蹈已往察哈爾的覆轍，這是要靠全國民衆的推動的力量，要靠政府毅然採納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

生死關頭的華北

關於中日談判，中央社本月五日的東京電訊說，中日談判有於一週內暫告段落的可能，將華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兩大問題擱置不談，留待將來談判。有些人盛稱這是一個『合理途徑』，其實在事實上沒有這樣簡單。

據我們所得的消息，宋哲元最近曾電京報告，歷次在津和日軍司令田代協商所謂『開發華北經濟』結果已由雙方決定原則四項，舉辦事業八項。所謂原則四項，在表面上似乎說得很妙，一仔細研究其中的實質，便知道是完全斷送華北的賣身契：（一）共存共榮，（二）雙方互利，（三）對華北日本駐屯軍有裨益，（四）利用日本資本及人材。第一項和第二項原則在表面上雖有着『共』字和『互』字，但就已往的事實上看，究竟是誰存誰榮誰利，這

是誰都看得出的因爲國家的主權被侵略者摧毀無遺這些好聽的名詞只是侵略者的烟幕彈；有着這樣的煙幕彈做憑藉；他們更可以盡量掠取認爲於他們有利的一切。第三項原則更可給與華北日本駐軍以橫行無忌的機會，因爲怎樣才算有『裨益』這個範圍是有着無限制的廣大的。第四項原則給與日本以囊括一切資源和管理權，因爲在中國喪失主權的條件下，侵略者的投資和人材就是侵略的工具。

除四項原則外，還有八項細目；這些指的便是聽任侵略者建築鐵路，開闢港埠，開採煤鐵礦，推廣植棉，『合辦』航空，發展郵電交通等。這種種要求的內容，無異把整個的華北奉送。日本對於華北的侵略，在實際上已着着進行，所謂可以擱置不談者，絕對不是延擱的意思，實在是無須再談的意思。這種形勢的嚴重，是很顯然的。我們以爲中央政府對於這種重大的問題，如認爲所傳不確，應加以否認；如所傳果確，應對地方當局加以有效的制止。就是由於地方當局擅自辦理，在責任上，中央政府也是無法諉卸的。

宋哲元表示決不願做亡國奴這誠然是全國同胞所樂聞而致敬的，但是據說宋氏認爲

敵來佔據領土的時候才與一戰，這却是不明白近代亡人國家，不一定要用正式佔據領土的形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的主權被蹂躪，便在實際上做了亡國奴。宋氏又常表示服從中央意旨，不願單獨行動，我們認為中央對於華北的危迫，不能再躊躇了。

二

在『共存共榮』『雙方互利』的煙幕彈之下，綏遠的危機最近已到了非常緊張的階段了！記者草此文時，北平傳來消息，偽軍集中於百靈廟商都一帶者已達四萬人，準備分兩路進攻；同時在察北康保，還有偽『滿』援軍湧湧而來。我們的民族敵人要使綏遠完全冀察化，造成事實以實行無須再談的故智，這已是擺在眼前的實際狀況了！

傅作義表示堅守保民守土宗旨，敵來侵犯，決予痛擊，這種精神是全國民衆所擁護的，但是綏遠是整個國家的重要屏障，綏遠的安危和整個中國有密切的聯帶關係，不是綏遠一省的利害問題。所以保護的責任，在有守土之責的傅作義，固屬責無旁貸，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責任完全丟在傅作義一人身上。在事實上，敵方前線動員四萬人，還在遣兵調將，從偽『滿洲

『國』方面積極增援，我們如聽任傅作義孤軍作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無法保存綏遠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督責綏遠的地方當局以守土之義，一方面却須動員全國輿論，督責中央政府迅速增援，發動整個的民族解放戰爭。

我們看到華北的形勢，顯然可以看出一方面儘管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談判，一方面却在實際上一件又一件的國權的斷送。所以我方儘管在外表的姿態上表示強硬，這是斷然不夠的。不但不夠，而且反而足以迷亂一般人的目光，增加絕不可能的幻想。日外務省發言人最近對報界公開宣言：『日政府對中日談判的態度並未和緩，今後亦不願變更。』我們還可以蒙在鼓裏自欺嗎？

中蘇友誼與遠東和平

一

本期本刊和讀者諸君見面，正是十九年來艱苦奮鬥日趨光明的蘇聯舉行國慶的時候。我們看到蘇聯已往的艱苦的境遇和由奮鬥中得到的勝利，一方面要向它慶賀，一方面對於我們自己民族解放的努力也更感到興奮，因為我們深信中國只須能全國團結起來，向着正確的途徑作堅決的鬥爭，中國必然會有着光明的前途，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在上期本刊裏曾提出『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一個是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還有一個是要極力運用當前的國際形勢，對於英美法蘇等國，只須不妨礙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工作，我們都要極力造成有利於我們的友誼關係，尤其是和我們土壤相接，利害更是密切。而對外『不抱侵略野心』的蘇聯。現在適逢蘇聯的國慶，我們願努力救亡的全國同胞對

於這個問題更加以嚴重的考慮，我們並願對於這件事貢獻一點比較具體的建議。

關於這方面，我們不得不敬佩孫中山先生的眼光遠大。他在臨終的時候，有一封很懇摯沈痛的遺書給蘇聯的當局，在那裏面有這樣的話：『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的真正同志的人們。故我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的工作……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合作……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那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的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我們——在這樣嚴重的國難中的我們——捧讀中山先生的遺書，感覺到句句精誠，字字血淚，認爲我們必須迅速採用具體的方法，團結中蘇的友誼，共同反抗侵略，保全遠東和下。

所謂和平運動絕對不是可在侵略和被侵略的條件下實現的，所以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和平爲基礎，即與許多國家訂立不侵犯條約，彼此互不侵犯，便沒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存在。不僅如此，蘇聯更和法國訂立法蘇互助協定，和捷克訂立捷蘇互助協定。不侵犯條約還只含有消極的意義，互助協定却更有積極的意義，因爲參加互助協定的國家不但彼此互不侵犯，如遇有第三國來侵略任何一國的時候，彼此還有互助抵抗侵略的責任。中國正在搶救危亡的關頭，應該用全力抵抗侵略，這固然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就被侵略的方面說，中國實爲蘇聯在遠東的前方，前方淪亡，後方的危險必大大地增加。這兩大國在抵抗侵略上實有共同的利害，所以這是互助，不是單方面的倚賴。遠東和平的保全，中蘇兩國的密切友誼實在是最重要的基礎。當然，中國的民衆和蘇聯的民衆本來就有着很好的友誼，但是兩國有了具體的互助協定，更得到具體的保障，同時也更可使侵略國有所顧忌。

互助協定和所謂軍事協定，性質根本不同。軍事協定是以侵略爲目的，互助協定是以抵抗侵略爲目的。遠東和太平洋的和平固以中蘇友誼爲基礎，但太平洋各國贊助這個宗旨的

當然也可以加入造成太平洋集體安全的保障。不過中蘇兩國因國土接近，在抵抗侵略方面，有先做榜樣的必要。根據這個觀點，我們主張中蘇應迅速訂立互助協定，以互助抵抗侵略爲目的。

侵略中國最殘酷的國家，口口聲聲以「防共」爲要挾，實際上他們所謂「防共」已成了侵略的代名詞，這是誰都可以看出的。他們所謂「防共」就是先滅亡了中國，再進攻蘇聯。中蘇兩國政制儘管不同，而抵抗侵略却是有着共同的利害。法國和蘇聯的政制儘管不同，但因爲要互助抵抗侵略，他們儘可以訂立互助協定，遠東的中蘇也同樣地受着侵略者的逼迫，所以也需要訂立互助協定。我們希望中蘇兩國政府各爲着本國和遠東的真正和平，對這件事加以積極的努力，並希望中蘇兩國的民衆各爲着本國和遠東的真正和平，對這件事加以積極的促成。

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

在我們的民族正在極危殆的境遇中掙扎的時候，我們對於國際形勢和國內時事的進展，總是從有利於民族解放鬥爭的觀點看去，總是存着滿腔的希望——希望這些事實的進展能夠轉動到有益於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

當「友邦」在華北從事事實上猛進侵略，外交談判在南京談至第六次還在停頓狀態中的時候，電訊傳來蔣委員長由京乘飛機飛到西安的消息。這消息很引起國人的深切的注意，都要知道他在這樣緊張的時候飛到西安負有什麼重大的使命。和華北接連的西北實為抗敵救國的最前線。依我們所知道，西北的將領對於抗敵救國的情緒都非常的迫切；他們所以還躊躇未即發動，是由於中央對於抗敵具體的辦法還未公布最後的決定。整個中國應即團

結起來發動民族解放的神聖抗戰。我們從這個主張做出發點，希望蔣先生這次西北之行，對於這個重要的任務能有積極的發展。

我們認為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須靠整個中國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當然，這裏所謂對外，是要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當前最大的最殘酷的唯一敵人。）這個需要是很顯然的；我們用整個中國的力量來抵禦外侮，效力的偉大，當然比任何局部的孤軍抗戰來得大。整個民族的生死戰，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我們必須用整個的國力來作堅決的抗戰。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反對消耗對外力量的任何內戰，我們要停止一切內戰，把一切力量都團結成一個陣線，對付我們的共同的最大敵人。我們立於民衆只知救國不知其他的立場，在這個迫切需要全國團結一致救亡的關頭，應該用誠懇的態度提出這個重要的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

我們認為這是當前抗敵救國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我們以為凡是誠心救國運動的人們，應該用種種最大的努力，促成這重要條件的實現。

抗敵救亡的神聖的偉大工作，是要靠我們全國團結起來作堅決的鬥爭。不能存着任何倚賴性。這當然是一個切要的認識。但是近代的任何國家，絕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可以『閉關自守』的，國際的形勢和各國的政治都有着密切的關聯。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極力鞏固整個國家對外的力量，一方面也還要極力運用當前的國際形勢。

講到這一點，最近新任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氏的出國赴任，值得我們的特殊注意。蔣氏於十月廿六日離滬出國的幾天裏面，在宴席發表的幾次演辭，頗有重要的意義。例如他說中蘇兩國「就地理說，邊境相接，地大物博，與我國情形頗相類似，都能夠不求於人，自食其力，不抱侵略野心，即願意維持世界和平。」他又說「一國外交的運用，決不是『乞憐』和『叩頭』的方式所能成功，務以雙方利益平衡為依歸。」

我們的民族向以愛好和平著名於世界，但愛好和平是在獨立平等的條件下實行的，不是甘心做奴隸的代名詞。我們對於要滅亡我們的國家和奴役我們的同胞的國家，我們絕對

不能以『愛好和平』遮羞，但是對於其他的國家，如英美法蘇等國，只須不妨礙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工作，我們都要以友誼的態度相待。這幾國裏面，蘇聯尤其和我們有着利害共共的形勢。侵略我們的國家的政策，是要先滅亡中國，再來進攻蘇聯，這已是全世界公開的判斷。蘇聯的當局屢次宣言他們決無意侵略別國的土地，但是誰要侵略蘇聯的一寸土，他們是要用武力對付的。但是他們爲着積極建設，要把被侵略的危機努力減少是無疑的。中國假使被滅亡，於蘇聯是有害無利，這是誰都知道的，反過來，有共同利害而又彼此『不抱侵略野心』的國家能有相當的聯絡，雖儘管各爲本國的利益打算，對於抵抗侵略的力量是要大大的增加。這不是彼此有所倚賴，實在是互助的互利的方方法。這種有利於我們抗敵救亡的國際形勢，是我們於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重要條件之外，所要共同努力促進實現的最重要的另一個條件。

國防前綫的華北

我在上期本刊對於侵略者在中國「就實避虛的侵略」曾經痛切陳述，認為這實在是當前最大的危機，比「決裂的危機」還要大千萬倍，認為在「談判自需極冗長之時間」裏面，他們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幹着，幹了就算數。我們很沉痛地看着這一週來的事實進展，沒有一件事不在證明這個毒辣的策略的邁進。自所謂「改組冀察政權及增加行政效能」實行以後，齊燮元輩彈冠相慶，加入冀察政委會做委員，更使華北政權漢奸化；石友三被任為所謂冀北邊區保安司令，漢奸羣的勢力更為擴大；同時起用西原借款的經手人李思浩做什麼經濟委員會主席，朝夕奔走於侵略者駐軍司令和武官之門，仰人鼻息，秉承意旨，現在已經幹出的好事有擅訂航空協定，把國防所托命的航空權斷送，同時龍烟鐵礦等富源，滄石鐵路等交

通要綫，都一任侵略者擺布；一件一件的作事實上的斷送。政權和經濟權一件件都在事實上歸到侵略者的掌握，便什麼事都可以隨意的幹。侵略者的註津軍都和領館已陰向華北移民，爲經濟侵略，竭力移殖，他們在平津通豐和北寧綫的僑民激增，已達二萬餘人，並爲擴大領館與警察權，積極向非條約市鎮發展僑商，爲實現大規模領警權的警綫。在北平和天津都已着手增加警權。除政權經濟權和警權等都在事實上一件一件地掠取之外，最近又在醞釀所謂文化委員會，使平津高等教育經費歸冀察方面主持，這樣一來，文化也可以漢奸化了！

這樣，我國當局雖希望『從容開誠協商』，在實際上是無異眼巴巴地望着侵略者很不從容地從事實上掠奪華北了。

二

華北是當前中國國防的前線，華北再斷送，整個中國更沒有翻身的日子，那真是『自署亡國之符券，世世子孫，真將永劫不復！』這種慘禍的危機是迫在眉睫的了！補救的辦法，我們只須看看侵略者所擔憂的，就是我們所應採取的救亡途徑。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提出的

意見，值得我們的深刻的注意。他認為日本對華工作的方法，應隨時促進下列數點的實現：

- (1) 以威力脅迫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
- (2) 慎勿以實力粉粹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
- (3) 嚴苛監視並排擊各實力派的精誠團結，自立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
- (4) 嚴防中國當局的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
- (5) 務須防阻馮系實力（指宋韓言）與閻張陝北紅軍的總聯合而抗日。
- (6) 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份子，與以實力的援助，使它鎮壓抗日份子。

三

根據他們所擔憂的『數點』，我們認為在國防前線的華北以及其他各地的『各實力派』負有守土之責者，不但在敵人顯然用武力來侵略的時候，就是在本文第一節所陳述的在煙幕彈下的實際侵略，也應該嚴厲拒絕，用『實力』來保衛中國的國土主權。現在全國人民對於亡國痛慘的覺察和救國的熱烈情緒，已不是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時候所能比擬的了，

所以局部的救國抗敵並不致再陷於以前那樣孤軍抗戰的局面，必然地是整個民族奮起救亡的前奏，必然地是要得到整個民族的忠誠擁護。我們深信到了這樣的最後關頭，不但全國民衆對於真正發動民族解放鬥爭的『實力派』能給與一致熱烈的擁護，就是全國的軍心，也是要和全國的民心團結一致的。這是整個民族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也是『各實力派』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這是我們要竭誠對國防前線『各實力派』進言的，同時全國救國民衆也應該用全力推動這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的實現。至於應負起領導整個抗敵救亡責任的『實力派』，全國民衆當然更竭誠希望他們明白這已是全國的一致要求。

此外關於全國集中力量於救亡，以及國際大勢的運用，雖說來話長，但是看到侵略者所擔憂的『數點』，我們所應毅然決然採取的重要的實際途徑，也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就實避虛的侵略

全中國的人民所集中注意的中日外交問題，據日本外務省的看法，說中國『既表示充分贊助調整中日關係的基本觀念，故至少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這『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這是有關整個中國存亡的關鍵所在，是我們所應該嚴重注意的。同時由東京傳來消息，日本對華北志在必得，採取就實避虛的辦法，從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所條陳，用重大武力迫使。（記者按，請注意他們是打算好的，無須真打的一貫的場便宜政策）冀察魯晉綏各省當局就範，冀察政務委員會高等顧問建川中將在吉與關東軍當局有過好幾次的協商，又帶有新方案到平，傳達日方各要人後，即開始作更進一步的策動。所謂『基本觀念』所謂『新方案』依『友邦』最近在華北的實際行動看來，實等於就實避虛的侵略。就實避虛

的侵略比強硬態度的侵略就被侵略者說是更爲狠毒的策略；因爲同是侵略強硬態度的侵略，還可使被侵略者明白亡國的慘禍迫在眉睫，共同振作起來，作死裏求生的奮鬥；就實避虛的侵略便比較容易麻醉被侵略者的心理，不明白在實際上是已經把整個國家的命脈斷送了，做了實際的亡國奴而自己還不知道，這樣一來，更不會想到什麼抵抗的問題，更容易達到侵略者『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更容易辦到侵略者『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這實在是當前最大的危機，比『決裂的危機』還要大千萬倍！這是我們要大聲疾呼，願全國同胞時刻加以嚴重注意的。

二

事實勝雄辯！日本一面倡言『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一面却在華北着着進逼，『志在必得』。天津日總領事堀內公開宣言華北經濟開發原則已定，只須按計劃進行；中日在南京談判，無論結果如何，決不致影響此事的進行；最近竟在豐台籌設警署；在平津一帶舉行大規模的所謂『秋操』，偽軍對綏省進攻的陰謀正在積極進行。總之在『談判自需極冗長之

時間」裏面，他們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幹着，幹了就算數，決不受任何談判結果的影響！

談判的結果當然不是絲毫沒有，他們很可以在『就實避虛』的策略下達到他們的實際的目的。例如他們要修改中國的教科書，並視察中國的學校，以『根絕排日』這很顯明地是要在全中國實行奴化教育，中國的文化根本要遭受到極慘酷的打擊，這種亡國條件是誰也知道不應接受的。但是有人說我們的教科書儘可只載事實而刪除解釋，例如『九一八』的國恥，我們只載這件事的發生，爲什麼有這件事是無須解釋的，這樣接受日本的要求修改教科書便可馬虎過去。其實我們高分沈痛的紀念『九一八』侵略者却在興高采烈地紀念『九一八』同一事件，同一紀念，便大有不同的解釋。受侵略者爲什麼不能對自己的子孫解釋被侵略的事實？這是不是已做了亡國奴的明證？至於『視察』有些人說不妨代以『參觀』，那個條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實在實際上這樣的『參觀』也就等於『視察』，徒然騙騙自己罷了！

就實避虛的侵略也可以說是軟性的侵略這裏所謂軟性的侵略和尋常的意義又有些不同。尋常所謂軟性的侵略是含有漸進的意義；這裏所謂軟性的侵略，在質的方面，仍然是激進而不是漸進的，所不同者只是不拘於表面上的名義而已。例如最初日方提出所謂三原則，中國民衆知道這是亡國的原則，紛起反對，他們就宣言並不必拘泥於三原則，但一直到現在，所謂根絕抗日，所謂中日『滿』的合作，所謂共同防共，儘管在名義上或方式上千變萬化，而最後總是鏗而不捨，絲毫不離他們原來『志在必得』的宗旨。

我們所努力爭取的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獨立解放！我們不能在任何煙幕彈下犧牲我們民族的生命！我們不要忽視就實避虛的侵略是滅亡中國的更毒辣的侵略！

在歧途上的中國

關於中日的外交問題，我們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們曾提出兩點：第一、要調整中日邦交，有個先決的大問題，那便是中國要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其他有損主權的協定；第二、中國政府應嚴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對付外交，外交絕望後即應採取『斷然的處置。』我們認為這兩個要點，是全國對於外交途徑所不可絲毫放鬆的。

中委王寵惠氏最近對新聞記者暢談中日交涉問題，說『目前中日關係的緊張，爲無可掩飾的事實，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後的關頭，只須看看日本的積極準備，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誠如王氏所說，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

不可苟延片刻，換句話說：中國現在還是下決心嚴保國土和主權的完整呢？還是再作進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國，就是自己還要敷衍，對方也不讓中國敷衍了！

在這個艱危的時候，中國爲保全民族的生命計，應有自動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則下的外交，然後能堅持到底，步驟不亂；倘若爲對方恫嚇所威脅，不惜破壞國土和主權完整的原則，以遷就對方提出的無理要求，那正中了他們的詭計。日本一方面派桑島東亞局長帶着『最後的話』來中國；一方面日本軍部各領袖公然宣言，他們對於中日局勢所採取的立場，可概括於下面的一句話，那就是日本必須充分準備於必要時訴諸武力。不但口頭上的恫嚇而已，他們在華北幹着大規模的長時期的軍事『演習』，更緊張地脅迫宋哲元氏漢奸化；在華南大增派其海軍，耀武揚威，肆行無忌；恫嚇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最近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報告關於中國的情報，竟老實說：『帝國如欲對華發動口實，隨意可得，故看到中國的官民誠惶誠恐對日不敢犯主義，殊極可笑。由此益可窺見帝國的威力，帝國安可不乘勢進攻，奪取特殊的權益？』又極力主張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以威力脅』

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慎勿以實力粉粹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份子，與以實力的援助，使他鎮壓抗日分子。』這些是多麼怵目驚心的話語！但是中國的全國國民決不容許在恫嚇中斷送任何部分的國土和主權！

二

以上所說的第一要點是我們應堅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不受任何恫嚇所動搖。其次我們所要嚴重注意的，是遠察世界大勢，近觀中國現實，在侵略者殘害我們民族的生存而無法用外交途徑挽回的時候，我們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敗主義的麻醉，認為發動保衛國土主權的抗戰就是等於亡國。這實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們大聲疾呼嚴厲糾正的。我們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滬各報館之連署』的中日關係緊張中吾人之共同意見與信念的宣言，說什麼『釁端既起，中國如作城下之盟，即為自署亡國之符券，世世子孫，真將永劫不復。』在未抗戰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

於『衛國』一詞以後即緊接上『殉國』的消極名詞我們對於連署這個宣言的『掌持輿論，同爲公衆喉舌，對內對外，均有宣達公意之職責』的各報，不免感覺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們固然知道主持各報的先生們對於愛護國家民族的動機，並不後人，絕對無意爲侵略者張目，但無論何國，輿論態度總較政府進一步，尤其是在外交緊迫的時候，民衆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後盾。現在竟於無意中替侵略者廣播『恐日病』的毒素，這是很可痛惜的。以『純粹不戰而勝的方式』的鄰國報界，對於中國人民保衛國土主權的願望，向來缺乏同情，而這次對於這個宣言，獨宣稱『倍加贊揚，並以誠意接受』我們自己跑進了他們的圈套，是很顯然的。

目前的形勢，使我們回想到『二十一條』時的慘象，但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下的中國不應該是當時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國民也不是當時的中國國民了！

外交的途徑

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漢口事件，虹口事件，好像連珠似的不幸的事件，紛至沓來。這些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友邦』的強硬的態度，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最近雖仍遣兵調將，耀武揚威，但據說經過他們的外務、陸軍、海軍三省的聯席會，決定仍置重心於外交交涉，要求中國政府乘此機會，解決妨礙中日國交的一切懸案，並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掃除『排日運動』的禍根，同時樹立救急對策。據路透社東京電訊所傳，讀賣新聞所載日本外務省的主張如下：

(一) 創立緩衝區域，包括冀察魯晉綏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惟一切其他的權利與義務，如官吏的任免，賦稅的增收，及軍事的管理等，都應交給當地的『自治』政府；

(二) 利用目前時機，設法將中日間的交通合作，加以解決，其中最著者為航

空問題。(三)中國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的關稅，實行根本上的修改。(四)中國應盡量聘用日本顧問。這震動一時的四項條件，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在各報記者詢問的時候，既不予以證實，亦不加以否認。據南京「某外交家」的意見，說中國當局還未接到此四項要求。但無論如何，日本對於中國還裝腔做勢，說是置中心於外交交涉，他們的目的很簡單，仍希望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在中國撈去一大串利益，同時把中華民族的生命前途，全置在他們的全力支配之下。日本要使華北五省『東北化』，早已明目張膽地對世界宣布過，所謂『自治運動』，始終在發縱指示，未曾忘懷，早是公開的祕密。所謂『自治政府』，也就是傀儡政權和漢奸政權的混合物；官吏的任免，賦稅的徵收，軍事的管理，乃至『一切其他的權利與義務』，都和中華民國脫離關係，這很明顯地是把華北五省獻給『友邦』，作為更進一步控制全中國的根據地。此外如第二項的掠取中國的航空權，第三項的掠取中國的財力，第四項的掠取中國的軍權，在在都和整個中國的命脈有極密切的關係。航空權，他們曾屢次向中國政府要求過。減低關稅為走私的要挾，也是公開對世界及中國宣言過的。聘用日本顧問，依我們所知

道，也已由川越大使向中國張外長提出。總之，這四項條件在實際只是舊話重提在『友邦』方面是認爲當然的了。據中央社的東京消息，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曾於廿五日往外務省訪問，外相有田表示特別注重於根除『排日主義』和根本調整中日關係兩點。所謂根本調整中日關係，除強迫中國政府答允他們奉送華北五省，航空權，關稅特減，軍事顧問，等等的亡國條件外，還要加上對於東北四省已失的土地和當前快要失去的有關國命的種種，都須具有曠達欣然的態度，一點不要有反抗的言論行動；他們甚至要求修改教科書，至於民衆的救國團體，那更是他們所視爲絕對反動的東西——平心而論，在日本把它們看作是絕對反動的東西是並不錯誤的——此外再加上所謂『共同防共』、『友邦』在外交上向我國所要提出的內容，至少在目前，可以說是都包括在內了。

二

日本的僑民在中國受到殺身之禍，這在我們當然是覺得抱歉的。但是這類事件，自有它們的常軌的外交途徑可以遵循，自有依法賠償的方法可以援用。我們主張整個民族的救亡

圖存，反對侵略國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摧殘不是暗殺幾個個人所能挽救的，所以我們並不主張捨去整個的對象而對少數私人爲難。但是卽就各項『不幸事件』中的遭難者而論，犧牲者不過一兩個個人而已；這種事件的嚴重性，拿來和中國喪失幾省的國土，淪入奴籍者動輒數千萬人民的慘劇，兩相比較之下，其中的差異，是多麼大啊！我們未曾佔據日本幾省的土地，未曾奴役他們的人民，不過因爲他們有一兩個僑民在中國被害，他們的政府就那樣大張旗鼓地向中國大辦其強硬的外交；中國遭到那樣慘酷的侵略，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面更應該怎樣地努力！

『友邦』對於中國的外交原則，簡單說起來，不外是要想不費一兵一卒，撈去一大串利益。他們希望在樽俎之間，可以把整個中國的生命線滅盡，成功一大筆的好生意！我們也應該有我們的外交原則。我們的外交原則是什麼呢？是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這個基本原則是全國上下所當嚴守而不可絲毫放過的。

當成都事件發生時，日外相有出認爲『除懲治兇犯賠償損失等慣常要求外，有採取基

本步驟之必要』宣言『兩國政府應調查其起因而予以根本的解決』同時日外務省接見外國新聞訪員，宣稱『自成都事件發生後，中國全國已充滿反日情緒，類似易致燃燒的氣體，一經點燃，即可爆發，故日本目前至急之要求，乃在消除此種氣體，中日當局亟應考慮正當方略，俾得實行此種急迫工作。』最妙的是當時外國記者裏面有人問這位發言人，中日事件究竟是起因於最近華人盛行的反日情緒，還是起因是華人對日本不滿的結果所致，這位發言人躊躇着回答說他不知道。我們贊成有田所謂『採取基本步驟』，『予以根本解決』也贊成日外務省發言人所謂『正當方略』，但是我們所要特別鄭重提出的是，日外務省發言人所有意圖迴避，托詞『不知道』以求遮羞的那『根本』，『起因』，因為這正是『基本步驟』，『正當方略』所在的地方！

現在中日間發生許多不幸事件，如果要在外交上求枝枝節節的解決，那是不可能的。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記者在他們的社論裏說過：除非每一個日本人用一個保鏢跟着，雖也不能擔保他沒有危險，這是任何國家的政府所不能擔保的。我們反對對於個人的殺害，絲毫不

願替暗殺個人的行爲辯護並且以爲在調查明確之後我國當然還要依國際慣例，負起懲兇賠償的責任；但同時却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那就是如要根本消除許多不幸的『一經點燒即可爆發』的事件，必須在一個大問題解決之後；這大問題便是中國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其他種種喪權辱國的協定。這是一切不幸事件的先決問題。倘把這個先決問題擱開，要想枝枝節節解決許多不幸事件，斷然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倘若不注意這個先決問題反而再火上添油，提出更多的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條件，那不是消除『易致燃燒的氣體』，而是努力增加『易致燃燒的氣體』。

日本在中國不過死去了幾個個人，他們的政府便藉此煽動全國民衆的激憤，大喊『現在已發動自衛權』，中國遭受着幾省失地數千萬人民淪入奴籍的慘禍，中國政府更須怎樣結全國民衆來『發動自衛權』？所以我們主張中國政府應嚴守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根本原則對付外交，外交絕望後即應採取『斷然的處置』！

現代國家與民衆運動

有些人聽見民衆運動就不免害怕，其實民衆運動是現代的國家裏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無論是號稱民主政治的國家如英美法或法西斯的國家如意德或社會主義的國家如蘇聯，都有他們的民衆運動。中國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期，對於民衆運動的努力，現在還有許多人記得清清楚楚。而且當時北伐的成功，大半是靠有民衆運動做革命軍的先驅，所以往往革命軍還未到一個地方，因有民衆的積極響應！已先聲奪人，使敵方膽寒！這也是許多人記得清清楚楚的。

我們看到各國的選舉，更可以知道他們的民衆運動和國家政治是分不開的。例如現在美國正鬧得熱烘烘的總統選舉大運動，這裏開大會演講，那裏開大會示威，這裏研究，那裏辯

論全國各角落里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幼，都被激動起來，他們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來，他們的思考力都被增強起來。你在隨處隨時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民衆運動的活躍。這也可以說是現代國家中一個重要的象徵。當然，像中國曹錕時代的賄選活劇，那運動的進行是在妓院裏，旅館裏，酒館裏，只在妓院旅館酒館等等的地方，少數走狗爪牙的活動，熱鬧一下；所謂民衆，都很漠然，並不感覺到有什麼一回事，就是偶然聽到關於這種醜態百出的新聞，也不過視爲茶餘酒後的閒談資料，也不感覺到和他們有什麼切身的關係。這種選舉，當然和黨民衆擁護的選舉不同；在近代的國家里是看不到的。

蘇聯的注重民衆運動，也在許多事實上表現出來。最近的例子是全國各角落里對於新憲法討論的熱烈。在他們的各工廠，各農場，各種各色的機關，工人農民以及其他的工作者，對此事都有大規模的熱烈的研究和討論。在他們的幾十萬人的體育大檢閱，爲着保衛他們的國家，『你們準備好嗎？』的問句一出，幾十萬人同聲一致的回答說：『準備好了！』那山崩海裂似的民衆的吼聲，使你感到民衆運動的力量是怎樣的偉大！他們在積極推行集體農場的

時候，並不是僅僅由政府發幾個命令，由少數專家起草幾個計劃算數，也靠着民衆運動的力量，有組織地發動整千整萬的人加入，才克服種種困難而得到最後的勝利。

蘇聯和美國雖在政制上彼此不同，但是他們都有民衆運動，却是一個事實。有些人想到民衆運動，就以爲只是共產黨的東西，好像此外就沒有什麼民衆運動可說，而不知道凡是現代的國家，都是和民衆運動不能脫離關係的。

各國有各國的民衆運動，他們各有他們的目標。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是抗敵救國，所以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民衆運動是民衆救國運動。我們如果因誤會而不敢幹民衆運動，因此誤會而不敢幹民衆救國運動，那對於中國的解放前途的惡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所以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切的注意。

二

關於民衆救國運動還有人有些誤解，我們因爲民衆救國運動和民族解放的鬭爭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所以要提出來和諸君共同研究研究。

第一個誤解是認爲民衆救國運動是和政府對立的。其實民衆救國運動的唯一宗旨是在抗敵救國，和民衆的救國運動立在一條戰線上的政府應該和民衆合作，在合作形勢之下，民衆救國運動不但和政府不致站在對立的地位，而且可以增強政府對外的力量。我們屢次說過，抗敵救國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須全國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在這種大目標下，凡是以赤誠努力於救國的人，第一要義是不要分散整個中國的抗敵力量。在抗敵救國的過程中，擁有二百餘萬軍隊的政府，當然是一個抗敵救國的很大的力量。在我們做民衆的惟一的念頭是怎樣和這個力量合作，由此達到我們救國的目的，並無意於推翻這個力量。不明白這個情形的人，往往把民衆救國運動看作反政府的行爲，實在是大錯而特錯。民衆救國運動是和漢奸賣國賊對立的，因爲漢奸賣國賊是在爲着本身的利益——其實這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而出賣民族利益，他們的目標和民衆救國運動的目標是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是無法合作的。但是政府只要和民衆救國運動作誠意的合作，決不會立於相反的地位，那些誣指民衆救國運動爲反政府的人，對於政府實在是莫大的侮辱！

還有一個很大的誤解是認爲民衆救國運動只是消極的行爲，甚至認爲只是搗亂的行爲。爲有某君竟大膽地說過，政府所希望於民衆的，不要民衆的幫助，只要民衆不要搗亂就夠了！搗亂是要分散民衆力量的，這當然也是我們所反對的，如果民衆救國運動是搗亂，那末我們爲着救國起見，不但不該提倡，而且還應該千方百計去消滅它才是。但是我們開頭就說過，現代的國家和民衆運動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假使民衆運動只是搗亂的行爲，那末現代的國家都變成搗亂的國家了；這種說法的所以不通，是因爲民衆運動，尤其是民衆救國運動，確有它的積極的教育的價值。一盤散沙的民衆是沒有力量的，必須有組織的民衆才有力量；組織的工作須在平日進行，因爲這裏面包含有種種的實踐上的訓練，不是臨時抱佛脚所能馬虎辦到的。民衆救國運動的重要工作就在組織民衆，在實踐上訓練民衆。有很多人對於民衆救國運動的概念，以爲就只是聚集大衆作示威運動。羣衆示威運動不能包括民衆救國運動的一切，雖則它是這種運動在必要時的一種表現——只是一種表現。卽就羣衆示威運動的本身

說它就是一種民衆教育這行動的本身於有很大的教育作用。這裏面需要組織；需要領導；需要對於目標的深刻的認識，需要對於團結精神的涵養。這種種的教育作用不但給與了參加者一個檢閱了自己力量的機會和抗爭中一切知識，而且這種行動的宣傳，對於一般比較落後的羣衆方面比千篇文字的力量還要來得偉大。此外民衆救國運動有無數的健全的小細胞，每個細胞對於國際大勢及當前國難，都有經常的討論研究，各細胞間的聯繫和紀律都有嚴格的規定和實踐。這種細胞的充實和擴大，便是民衆救國力量的充實和擴大，將來和軍事力量聯繫起來，民力和軍力打成一片，民心和軍心結成一致，那便成了民族解放的中堅力量。

總之，民衆救國運動含有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教育民衆，養成有組織有訓練的集體的力量，是含有積極的意義的。這是現代國家的一個極重要的力量！

最後關於民衆救國運動還有一點要注意的，便是這種運動要設法使大多數人參加，參加的人愈多，集體的力量愈偉大。當然，在有許多不了解民衆運動的人看了，往往望而却步，自己不肯參加，反疑心少數熱心的主持者是在包辦，這種不幸的現象是極須補救的。

中國的立場

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中華民族的解放問題；但是中國是世界的一環，我們要使中國解放運動獲得最後的勝利，不得不嚴密地注意世界大勢，不得不盡量運用世界大勢，中有利於我們的各種條件。但是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我們要站在中國的立場。所謂中國的立場，當然是以中國的利益爲出發點。

我們對於中國內部，主張要全國團結起來，集中整個中國的一切力量，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誰都知道侵略中國的並不止一個國家，但是用最殘酷的手段，以最兇猛的姿態，要在短時期內置中國於死地的，在目前却只有一國。我們無所恨於這一國的民衆，因爲他們是受着本國侵略者的麻醉和壓迫，他們自身也是同樣的被壓迫者；但是我們爲着要拯救我

們所托命的國家的生命，對於侵略我國最殘酷最兇猛的這一國，不得不用全副精神來對付，這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所應該這樣的。因為我們要集中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因為我們不願有其他枝節來分散這個集中的力量，也就是因為我們不願有人破壞或減少這種對準目標的救國力量，所以對於那些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或類乎這樣有意轉移國人視線的主張，都要堅決地反對。

我們對於國際的態度，也應該同樣堅決地站在中國的立場。現在世界是侵略與和平運動的兩大陣營；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還是加入那一方面是比較最有益呢？這是很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加入侵略陣營是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利的，我們不妨毅然決然加入侵略陣營；反過來說，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加入和平運動是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利的，我們也應該毅然決然加入和平陣營。總之，我們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來替我們自己下判斷。

當然，我們所謂中國的利益，是指中國的獨立自由，並不是要步武侵略的國家去侵略別

人在目前我們固然沒有力量去侵略別人，就是將來有了力量，我們也不願幹這樣的勾當。

二

閒話少說，我們且回轉來再談談上面所提出的侵略與和平的兩大陣營。我們知道德國和意大利有勾結，日本和德國有勾結；這三個法西斯國家的聯合戰線，是和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影響，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我們自己的民族五年來所遭到的特別慘酷的苦痛，以及今後的大難，這是用不着我們多說的。侵略陣營要求世界殖民地的重新分割，不惜用戰爭來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這在我們處在『分割』之列的『弱小民族』是否應該加入他們的陣營，還有什麼疑問嗎？

也許有人說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國家，也各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例如戰勝國的英法要維持現狀，蘇聯要保全他們的經濟建設，都是顯明的例子。我們不否認各國含有爲着本國利益的動機，但是我們所注意的是這種運動是否有利於我們的中國。倘若有利於我們的中國，雖同時有利於英法蘇，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有所躊躇。我們的贊成世界和平運動，目的是

在反侵略反侵略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奮鬥，用自己的力量打出一條生路，這是無疑的，但是同時能盡力使和平主義者在各國抬頭，於我們的制裁當前的侵略，是有着有利的成分，却是很明顯的事實，所以我們要加入世界的和平陣營，並不是要拋棄自己的奮鬥而去倚賴別人，也不是有所偏於英國、法國、蘇聯或其他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國家，却是站在中國的立場，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爭取友軍的一種策略。就在尋常個人的關係說，有人要找個互助的朋友，我們便斷定他自己不要努力，或甚至疑他不要做人，這是合於情理的事情嗎？簡單說起來，我們自己要靠自己的努力是一事，運用國際大勢，聯絡友軍又是一事，這兩方面並不致於相淆，更不必混為一談；什麼事有益於那一國是一事，什麼事有益於中國又是一事，我們只要問這事是否有益於中國，如有益於中國而同時却也有益於別國，我們就武斷這是為着別國而置中國的利益於不顧，這是講得通嗎？

三

此外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便是等於不抵抗主義，不準備和侵略者

戰爭。其實世界的真正和平就在用集體的力量來制裁侵略的行爲我們所反對的是侵略的戰爭，而不是爭取世界和平的戰爭。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各國，它們的當局對於和平的意義，也許各有其想法，但真正的和平運動在各國民衆間的抬頭，無疑地是要給侵略者以一種嚴重的威脅。國際和平運動會派到中國來的達德君，即聲明該會一方面鑒於侵略國視條約義務如無視，所以『遵守條約義務』列爲原則之一；一方面鑒於中國受壓迫的事實，所以在該原則中加入『中國得保留其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權利』。我們並不是說僅僅有該會同情於中國的修改不平等條約，這件事就可不必有我們自己的鬥爭而可以坐享其成。我們絕對沒有這意思！我們一方面當然自己要加緊努力，一方面却也歡迎中國的朋友替我們宣傳，替我們增加國際上的聲援的力量。

倫敦泰晤士報最近評論希特勒在德國紐倫堡痛罵到世界和平運動的演說，該報社論有這幾句話：『這次演說的用意是在反對法俄兩國的互助公約，自屬毫無疑義。但是在現在的形勢之下，凡附近德國的各國都訂有這類條約，要它們放棄，實在是不可能的；可是倘若歐

洲的問題能得到一般解決的方案，使各國所締結的同盟條約都失去它們的目標，那放棄條約不但不能，而且還是可喜的事情；不過這非等到促成這類條約的原因完全掃除，是不可能的。」這是英國人站在英國的立場說的。我們中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也可以主張世界若要真正得到和平，必須掃除擾亂世界和平的原因，也就是必須制裁侵略者的擾亂。侵略我們的國家儘管也在高唱着『東亞和平』，它在實際上的行爲是在擾亂『東亞和平』，這是天下所共見的。我們不能因爲他們也在唱着『和平』，便不敢參加世界和平運動，因爲世界的和平陣營正是和侵略陣營對立着，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應該加入和侵略陣營敵對的方面。我們這樣做，不是爲着任何別的國家是爲着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而做的，雖則我們對於反侵略的努力，間接也是有裨於世界的真正和平。

沈痛的回顧與光明的展望

在本期的本刊呈現於讀者諸君前面的時候，全國同胞所痛心的『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即在目前了。我記得在『九一八』事變剛要發生的前夕，黃任之先生從日本視察歸來，據他在日本所親聞親見的情形，認為日本對於東三省是必然地要在短時期內掠取的。他回國後曾經爲着這件事情，親往首都去告訴我國的外交當局，而這位外交當局在當時却不肯相信，說日本無論怎樣，決不敢那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但是後來事實上的表現是完全證明了他的糊塗。

東三省於敵人不費一點力量，很迅速地淪亡之後，有些人還存着苟安的心理，希望對方滿足慾望，不再續進了。但是在這種幻想中，熱河隨着東三省的命運而喪失。這個時候，還有些

人希望能保全長城以南的國土，長城以北國土的淪喪並不能喚醒他們的迷夢。於是隨着東四省的慘禍，華北和華南都在作進一步的組上肉，陷入任人宰割的慘況。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的五年裏面，我們的國家的被侵略，是無時無刻不在那裏得寸進尺地擴大，現在已到了宰割全國的嚴重階段了。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兼程並進着，摧殘整個中國經濟的「走私」便是在武裝保護之下實行的，這不是很明顯的例子嗎？在全國上下鬧着「緝私」問題的時候，華北對於堆積如山的私貨，竟異想天開，對於這種私貨徵收一種僅等於現行關稅率八分之一的特稅，使違法的私貨一變而為合法的商品，可以通行全國，使走私的毒害更迅速地安穩地傳播到全國；同時無異獎勵經營私貨的奸商，增加漢奸的勢力。實業家穆藕初先生對這件事有過很沈痛的通電，說這樣是把「國家命脈，國民生計，完全斷送。」記者執筆寫這篇文的時候，「所謂冀察稽查處」已公然宣布成立了！

其實「走私」只是一件事，整個的「國家命脈」已在「斷送」和搶救的緊要關頭！據中央社的東京電訊，說日人現信與中國解決種種問題的有效辦法，只有武力，甚至有提倡什

『保障佔領』的『理論』，這不是要把他們的武力統治整個中國的前奏嗎？據密勒氏評論最近所記載，日人要求在中國的西部和西北部各省的各個主要城市，都要設立領署，各領署都須駐有日警和軍官。中國的西部和西北是比較地距離他們的直接勢力遠一些，但是這種處心積慮的布置，顯然是以整個中國為對象，那是不待解釋而自明的。『九一八』事變的導演者土肥原曾說過幾句很坦白的話，他說要使華北的『自治運動』推廣到全中國！

中國當前所遇着的嚴重問題不是爭氣爭面子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的每一個人要自拔於奴隸慘境的問題。這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每一個人，在這『九一八』國難五周年紀念所要真切認識的現實！必須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真切的認識，然後才能有團結禦侮的決心與事實的表現。

二

我們一方面很沈痛地回想到這五年來的國難一天天嚴重起來，被侵略的範圍一天天擴大起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所用其消極與悲觀，因為光明的前途已向着我們招手，

我們所要努力奮鬥的是要全國團結起來朝着這光明的前途邁進

這光明的前途不是我們聊以自慰的幻想：是有着鐵的事實呈露於我們的眼前的。講到國內方面，侵略者在滅亡整個中國以前，絕對沒有『適可而止』的可能，這是五年來的事實教訓。雖然這種教訓的代價是太慘酷的，但這教訓已深入於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者的心坎，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侵略者既以整個的中國為對象，中國要自拔於這種悲慘的浩劫，必然地要用整個的中國力量來對付：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是任何人所能憑空製造的說法，却是客觀的現實所喚起的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這種要求最近已一天天有着事實上的進展了。漸漸地已有多數人明白要拯救這垂危的中國，不是任何階層所能包辦，不是任何少數人所能包辦，不僅僅是軍事的力量所能有效，不是少數人的努力所能有效，必須團結全國的人力物力，放棄以前的一切成見，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當然，關於團結禦侮，目前的情形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還要積極努力使這個偉大的運動更充實更擴大起來。

立法院長孫科氏最近發表談話，表示政府將大赦政治犯這是在全國民衆要求團結禦侮聲中的一個好消息，我們希望政府能迅速地切實地執行。前在福建設立『人民政府』的李濟深陳銘樞諸氏最近都由政府取消通緝，其他的政治犯應當更易得到特赦了。此外廣西問題的和平解決，在我們民衆看來，中央當局應該和廣西領袖都一致對外，迅速促成團結禦侮的實現，否則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統一，在廣西所發動的抗敵救國的號召也不免變爲空談了。最後我們就民衆的立場說，一般國民鑒於外患的急迫，一致反對內戰，反對中國人殘殺中國人，主張大家把一切舊仇宿怨（倘若有的話）拋到九霄雲外，團結起來共赴國難；這種共同的心願，已一天天普遍起來，漸漸成爲強有力的輿論了。

講到國際方面，反對侵略戰爭的怒潮已成爲世界大勢所趨的一個重要象徵。這個重要象徵，凡是在稍稍注意國際情形的人們，是用不着多所解釋的。美國於八月下旬有反對團體一百萬人的代表團要求美國總統停止擴充軍備，締結世界和平條約。記者去年在美國遊歷時，親見他們的數千萬青年參加反侵略戰爭運動的熱烈，使人感到美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

頁即將呈現出來蘇聯和法西等國人民陣線反對侵略戰爭運動的激進！是諸君所熟聞的。我正在寫這篇文的時候，聽說英國工團大會也在討論組織人民陣綫的辦法。世界和平運動大會最近在北京開會參加者有四十國的民衆代表三千餘人，閉會宣言有這幾句很精要的話：『各國的人民，務必以鬥士的精神，維護和平……倘有一國違反國際法而從事侵略，因而破壞世界的和平，那末我們把它看作唯一敵的人。』

中國對於世界和平，也負有一部分很重要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在事實上『以鬥士的精神』以整個民族的集體的『鬥士的精神』制裁危害我們民族的生存而同時也就在擾亂和平的侵略者。這在一方面，固然是四萬五千萬的人民所組成的偉大民族，對於自己以及對於世界所應毅然決然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在另一方面，這種使命的執行，也是響應着世界大勢的正確傾向，有着無數的友軍。這是我們所要深切認識的，要用團結禦侮的努力向前爭取的。

侵略與和平

太平洋學會第六屆會議自八月十五日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玉斯美舉行，已於三十日閉幕。關於這個會議，伏生先生在本刊第十二期裏有一篇太平洋學會中的太平洋問題，有很扼要的評述，想諸君都已看過了。關於這個會議，我們所特別注意的當然是有關中國的問題——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問題是太平洋問題的中心。中國的代表胡適先生在這個會議席上揭穿『日本最後的目標，顯然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國』表示『中國民族現已抱定決心，誓必奮鬥到底，以維護本國的生存』。我們常覺得胡先生在國際上的聲譽（我在各國遊歷的時候，每和他們的學術界人物晤談，多問起胡先生）應該替祖國的解放問題在國際方面做些積極的工夫，而每以胡先生一向徒作『長他人的威風』的妥協論調為憾事；這一次對於胡先生的為國賢勞，不勝欣慰，希望他繼續為祖國的解放努力。日本的代表芳

澤謙吉對於侵略的掩護雖用種種詭辯但是所謂『欲蓋彌彰』無法自圓其說。中國的領土東北四省是怎樣失去的？華北的偽自治運動是那裏來的？華南的搗亂是何存心？這都不是可以用一手掩蓋天下人的眼睛的鐵一般的事實，但是芳澤却在會場上公開宣言『日本並未阻礙中國的統一！』在這種狀況之下，他主張『最好由中國改變態度而與日本合作！』至於他又拿出那套對國際宣傳的老調說：『日本向華發展，是由於人口膨脹的緣故，』這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濫調，伏生先生那篇文裏已根據事實作直截了當的駁復，我們在這裏不多說了。不過我們所不要忘却的是芳澤很坦白地告訴我們，『日本向華發展』是『勢在必行』的。『英美蘇三國代表曾於圓桌會議和會外談話間，向日本代表多方詰問，想使日本代表說出要在亞洲發展的限度，日本代表不願表示。其實這倒可以無須表示而自明的。』

太平洋學會會議是由參加的各國上層分子組成的，他們只有少數名流學者的隨便談話，雖在直接間接方面未嘗沒有暴露侵略者面目的效用，但是並沒有民衆的集體力量做後盾的實際行動，講到這一點，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九月三日至六日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和平

大會關於這個會議的內容，在本刊第十二期裏達德先生寫給本刊的一封信，已略露端倪。這個會議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集合全世界的擁護和平的一切民衆力量，制裁侵略的戰爭。這大會包含全世界人民大眾的組織，因為各國工會等等民衆團體推出代表參加，後面都有着數十萬數百萬的民衆做背景。因為有這樣偉大的民衆力量做基礎，所以不僅不是像太平洋學會那樣隨便談談算數，並且是一種行動的組織。在大會開幕以前的兩三個月裏面，各國的『發起委員會』已動員大量的民衆，開始大規模的反戰行動。英國工會領袖、法國總工會領袖、西班牙總工會領袖、蘇聯總工會領袖以及墨西哥、古巴等十餘國工會代表，都聯合發表宣言，籲請全世界各國勞工大眾積極參加世界和平大會。這次參加比京大會的有四十幾國代表，三千餘人出席。他們要在這次大會後，更力謀擴大這個制裁侵略的和平運動。曾經寫信給本刊的達德先生，聽說不久還要再到中國來組織中國的分會，堅決反對侵略的中國民衆，無疑地是要竭誠歡迎並贊助這個制裁侵略的和平運動。

談起主持這次世界和平大會的機關——國際和平運動會 (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它的緣起却很有意思。這個國際和平運動會是脫胎於去年在英國舉行的名震一時『和平投票』(“Peace Ballot”)。最主要的發起人是英國薛西爾勳爵(Lord Robert Cecil)。當時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正在尖銳化，這個『和平投票』是要使英國民衆對於國聯和集體安全表示統一的輿論。自動參加這種『和平投票』的工人達一千二百萬人之多。去年十二月英國政府不得不擱置對意國妥協的霍爾拉伐爾的犧牲阿國的方案，這個廣大的民衆力量，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倡導這個『和平投票』的人們看到民衆集體力量的偉大，想把這個運動的範圍推廣到全世界，於是集合英國擁護和平的各種力量，和法國的民衆力量發生聯繫。法國的急進社會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黨員，以及法國的總工會代表回答以熱烈的響應。這樣一來，在今年三月以後，由於各方面的努力，已使這個運動有着長足的發展。各國『發起委員會』於今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巴黎舉行發起會議，開會後舉行盛大的巴黎市民大會，歡迎各國代表，參加者有各種社團和各政黨的代表，共達二萬五千人。

我們知道在東西兩個侵略國橫行無忌的時候帝國主義者不願忠實執行國聯盟約所規定的集體義務，以厲行制裁侵略國，現在反而要藉口國聯盟約的無用，準備取消盟約第十條的制裁的規定。這次世界和平大會在北京開會，就要動員全世界的民衆的力量，揭破侵略主義的陰謀，擴大世界和平的運動。中國也有兩位代表參加。一位是大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位是經濟學家錢俊瑞先生。我們希望兩位先生一方面把中國民衆反抗侵略的眞正意旨宣布於世界各國民衆，一方面把世界各國民衆反侵略戰的偉大精神帶回中國來。

當然，中華民族解放的最後成功是要靠整個中華民族自身的努力奮鬥，並不是可以徒靠別人的同情乃至贊助所能見效的。我們擁護世界和平，正是要努力使我們自己也來參加反侵略的工作，是積極的，絕對不是消極地坐待別人來幫助我們。前者是把我們對於民族解放的努力，和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努力聯繫起來；後者便是沒出息的倚賴性，這兩方面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最近世界的趨勢是侵略與和平的尖銳的對立。和平的反面是戰爭。是侵略的戰爭。要得

到世界的和平，有許多人覺得這是要靠實力來對付的，不是手無寸鐵的民衆的反對宣傳所能濟事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我們誠然不能抹煞實力的效用。但是從另一方面想，實力是什麼？最直接的是海陸空軍等等的武器。可是這些武器是要靠人來製造的。是要靠人來運用的。這仍然不能和人脫離關係，當國際用武力干涉俄國革命的時候，國際聯軍所以終於失敗，固然由於當時俄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一部分也由於參戰各國勤勞大衆反對本國的侵略。這種歷史的教訓，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的解放運動是不能和世界的大勢隔離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奮鬥，一方面却也要和世界的反侵略的力量發生密切的聯繫。最近我國對於國際的這類集會都有得力的代表參加，這是一件很可以欣慰的事情。

侵略與和平，我們應該站在那一方面的陣綫：中國民衆的答案是可以從最近中國民衆的活動表現出來的。

回到了學校

光陰似箭，許多青年朋友如今過完了暑假，又回到學校了。社會是個廣義的學校，青年朋友們在這剛過去的暑假裏，雖暫時離開了狹義的學校，却到過廣義的學校裏視察了不少的現實的情形。我們由許多剛從內地出來準備回學校的青年的談話裏面，可以看出他們在這短短暑期中所注意到的事實，無論是關於國家的問題，或是關於青年本身的問題，都有過冷靜的檢討和沉着的思考。

在這短短的暑期裏面，華北的嚴重形勢顯然是愈趨尖銳化了。在中外各報上可以公開看到的是這裏華北日領會議，那裏日海軍武官會議，還有日陸、海、外三省代表在天津開高級幹部會議等等，那緊張的姿態是誰都看得出的。至於會議的具體內容，雖不是我們所得而知，但是鄒就公開看得到的報告，據說是要「進行所謂積極自主帝國外交，表面上雖不拘泥廣

田三原則，但聞川越將捨抽象而就實際較之廣田三原則實有過之而不無及」（華聯社廿三日東京電）。此外我們在公開的消息裏面，還可以看到所謂「高級幹部會議」一致通過的議案部門，有什麼「華北政權監督實現明朗化」、「外交方針具體化」（可和「捨抽象而就實際」的話參看）、「中日經濟提攜」、「非常時期適宜準備」、「陸、海、外駐華機關互相呼應」等等。我們還要看什麼內幕的方案嗎？只要看了這幾個題目，做的是什麼文章，還有什麼疑問嗎？

在這樣「磨刀霍霍」的緊張形勢下，我們再看到了幾個月來西南的局面，又要擔心着中國是否可以避免內戰慘禍的問題。全國人誰不知道？中國的力量就只是這一些，要怎樣運用那力量，才能對於民族解放獲得最大的結果呢？這的確是全國人民所懸系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對救國特別熱烈的青年們所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

關於民生方面，使人感到農村破產的深刻化和水災警報迭傳的可慮。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有水災是例外，沒有水災是常態。在我們中國，却適得其反！沒有水災是例外，有水災

却是常態這種痛心的事實我們可以視爲『常態』而不想追究它的癥結所在，加以挽救嗎？關於各處農村破產的慘况，那更是暑期中由學校回到家鄉的青年們所目擊心傷的事實，說起來是一言難盡的。可是農村破產和內憂外患有不可分離的聯繫，這不是僅就農村本身改善所能根本解決的。

在這種種令人無由自慰的環境中，也許稍稍能引起青年朋友們興奮的，只有我國第一次派遣大批選手參加世界運動會的事情。中國的運動家第一次顯身手於國際體育競技的舞台上，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可紀念的事情。這次世界運動會自八月一日至十六日在德國柏林舉行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中國爲這件事費去了二十萬圓的旅款。但是，一方面固然值得興奮，一方面却不要忘却我們只是飽吃鴨蛋而歸。當然，我們用不着垂頭喪氣，我們要在失敗中尋取教訓，作爲更向前努力的根據。

最後要談到青年本身當前的幾個問題。第一個要想到的也許就是求學的困難。能安然回到學校，踏進校門，算是很幸運的了；有些青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糊裏糊塗地被驅逐

於校門之外，有些地方簡直是整批地被驅逐出來，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訴！有些青年雖然勉強踏進了校門，學費是東借西湊得來的，怎樣歸還固然毫無把握，學費以外的用費怎樣籌劃也更屬茫然。這種苦況是我們做過苦學生的人所能深刻感覺到的；如今苦學生遍地都是，這種苦況也就愈益普遍化了。就是那些比較幸運的青年，雖有父兄能暫時替他們辛勤安排好，但是家裏經濟的外強中乾，是他們所心照不宣的。父兄對於他們求學用費的支持能勉強挨到什麼時候，却是他們所不敢想的。經濟困難還只是青年們所感到的困難的一部分。他們都是思想純潔的青年，問心原無可愧，於求學之外，所耿耿於心的只是要在救國運動方面盡一點力量，但是有時還不免遭受到出於他們意想以外的打擊。

有些青年知道自己的在校求學是無法繼續下去的，無論是由於經濟的困難，或是由於莫名其妙的无妄之災。於是他們便想尋覓職業。這又給他們一個很困難的問題。誰都知道，因市面的不景氣，各種事業的蕭條，要找得一個職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是初出茅廬的青年，缺乏辦事的經驗，碰壁的機會更多。據上海有一個成績比較優良的職業指導所的統

計，每日到該所登記的求職者平均有八九十人而能介紹得業者僅佔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便都成了走頭無路的人物！向來熱心指導青年的前輩，總是口口聲聲教誨青年要怎樣勤謹刻苦爲社會服務，這就爲社會服務的立場說，不能說是不對；但現在的實際困難却是無處找得職業，雖欲勤謹刻苦而也無從着手了！在這種地方，我們能盡怪青年嗎？要想找個職業，苦於沒有機會；要想入校求學，又苦於無法繼續；這樣進退維谷的青年，就我們所知道的，爲數實已不少，在這樣殘酷的社會裏，他們簡直不知道有何去路！這是青年自己的咎過呢？還是另有負責的人應該引咎呢？也許有人會想到這當然不能歸咎於青年，也不能歸咎於任何個人，因爲這是有關於整個的社會問題，不能怪任何個人的，這話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但是社會是不能自動的，必須有人力來改造它，所以社會的不合理，人也不能卸責，尤其是負有比較重大責任的人們。

青年們的當前問題，除了求學和求職外，大概都要想到國難。他們想到國難，大概也容易連想到所受的軍訓，因爲這似乎是入校的學生準備共赴國難的最有直接關聯的一件事。他

們所以要受軍訓當然是要準備參加爲國抗敵作戰。現在他們所受的軍訓，已能使他們有了這樣的能力嗎？

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我們知道都是在回到了學校的青年們的腦裏盤桓着的。

青年諸君回到學校了，根據諸君在暑期中對於現實的視察，就所看到的現實的需要，拿來和自己平日在學校裏所學習的比較比較，一定可以看出所受的教育有沒有什麼缺陷，提出來供教育家的研究；同時也可就根據這種視察所得到的結論，替自己很縝密地定下未來的計劃，作爲繼續努力的方案。

青年諸君回到學校了！我們竭誠敬祝諸君努力與進步！

世界的中國人

就量的方面說，在中國本國以外的世界上的中國人，總數達八百萬人之多，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鉅大的數目。在歐洲最小的國家只有幾千的人口（例如在法比邊境的小共和國安多拉 Andorra 全國就只有人民五千人），固然比不上這『世界的中國人』，就是比利時或荷蘭，每個國家的全國人口也不過八百萬人，世界上的中國人的總數可抵他們全國的人口！這好像除了具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華民國以外，還有一個具有八百萬人口的『第二中華民國』在世界上屹然樹立着。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祖國外，幾於布滿全世界的中國人，他們分布的情形，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大概如下：

地名	人數
----	----

暹羅	二、五〇〇、〇〇〇
----	-----------

英屬馬來羣島

一、七〇九、三九二

荷屬東印度

一、二三二、六五〇

香港

八二五、六二五

安南

三八一、四一七

蘇聯（包括西比利亞）

二五一、五〇〇

緬甸

一九三、五九八

菲律賓

一一〇、五〇〇

澳門

一一九、八七五

北婆羅洲

七五、〇〇〇

美國

七四、九五三

台灣

四六、六九一

加拿大

四二、一〇〇

印度洋羣島	土耳其	荷蘭	英國	中美	印度	澳洲	法國	日本	墨西哥	檀香山	高麗
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四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五、五〇〇	一七、〇〇〇	二〇、〇七四	二五、〇〇〇	二七、一七九	四一、三〇三

秘魯

五、七〇四

南非洲

四、五〇〇

新西蘭

二、八五四

委內瑞拉

二、八二六

智利

二、七〇〇

德國

一、八〇〇

葡萄牙

一、二〇〇

丹麥

九〇〇

巴西

八二〇

阿根廷

六〇〇

比利時

五五〇

意大利

二七四

這統計只是一個大概，因為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之後，遷徙無定，被迫回國的尤多，時常有變動。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人最多的是在暹羅和南洋。這兩處的總計，共達四百餘萬人，比全部八百萬人的數量超出了一半。在西半球，中國人最多的是在美國，約有七萬五千人。中國人在歐洲的比較少，就歐洲各國比較起來，以法國的為最多，約有一萬七千人；其次在英國，約有八千人。在波蘭以下的各國，中國人很少，大概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關於經濟方面，據倫默氏 (O.F. Remer) 所調查，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一萬五千萬圓；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三〇年間，華僑每年匯款回國達兩萬萬圓！

我在上面提起八百萬中國人布滿了世界，足見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這樣的感覺，尤其是因為看到中國人在世界各處的奮鬥，不像別國的人有着充分的祖國的保護。他們都是

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們出國的時候，不是像那班應該殺頭的將軍大官僚們，領着幾十萬的出洋費，堂而皇之地乘着頭等艙至國外去享福，却是過着「豬仔」的極苦生活，千辛萬苦，偷偷摸摸去的。一不留神，就被什麼移民局押到拘留所，陷入更深的地獄生活！我在海外遇着許多僑胞，他們談起當初出去的情形，往往聲淚俱下。

到了國外，他們過着極勤苦的生活。就是到了現在，你在美國可以看到在那個每遇星期日大家無不休息的日期，中國人的洗衣作還是一天到晚工作着，至於平日的夜以繼日，那更是家常便飯。他們的這種吃苦耐勞的能力，在西洋人看來是認為異常驚異的。國內的人想起華僑，通常的觀念是他們有錢，不知道他們的一些錢都是用血汗換來的。

同時因為具有這樣的吃苦耐勞的能力，而却得不到充分的祖國保護，於是更引起別國人的嫉忌，認為搶奪了他們的飯碗，隨處受到他們的限制，甚至虐待。斬荊披棘的中國人眼見別國的僑民得到他們祖國的保護，所得的待遇便大兩樣，很自然地要引起他們對於祖國的懷念。我到各處每和僑胞談話，無論他幹的是什麼事，無論他所幹的事的大小，無論他的知識

高低，總是充滿着愛國的情緒談起祖國總是要感到萬分濃厚的興趣和深切的關心。當然，他們談到祖國的不爭氣，喪權辱國的事件紛至沓來，也要攘臂揮拳，切齒痛恨。這不足怪，祖國政治的好壞，影響到他們在國外的生活，好像一枝測量氣候的寒暑表。你無論到何處，他們和你談起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戰的情形，真是熱烈得什麼似的！在那個時候，別國人看見我們的僑胞都要另眼相待，至少要和他多握一下手！報販看見中國人向他買報，都要連聲道賀，樹起大姆指誇讚着中國人！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在馬路上走路都要覺得格外舒服些！不僅是一些虛面子，荷屬的爪哇當局經此一聲霹靂，就趕緊把中國的幾個『愛國犯』從牢獄中釋放出來，世界的中國人對於祖國盼望的殷切，我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語可以把它形容出來！

當然中國倒霉，世界的中國人也隨着倒霉。例如墨西哥的驅逐華僑，在我國喪失東北四省之後，墨西哥的政府和人民對於華僑都更輕視虐待的程度也愈甚，排華的風氣也更厲害起來了。這是在墨西哥備受痛苦的僑胞所深刻感到的，其實不但在墨西哥，在任何地方，世界的中國人都是隨着中國的倒霉而愈益倒霉的。世界的中國人既和中國的休戚息息相關所

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奮鬥固然有着萬分的關心，對於中國的腐化階層，賣國誤國的人們也是要痛心疾首，怨恨徹骨的！

世界的中國人在已往是全靠着他們個人的掙扎而打出天下的，祖國對於他們只有萬分的慚愧。但是時代不同了，僅僅靠着無組織的掙扎是終於要被淘汰的。世界的中國人倘若沒有健全的祖國做後盾，前途是很暗淡的。據我在海外和僑胞們接觸的結果，知道他們對於這一點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我深信祖國一旦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他們一定要作英勇的參加，熱烈的擁護。

『第二中華民國』的光明前途是隨着中華民國而俱來！我寫到這裏，敬為八百萬的僑胞祝福！敬為八百萬僑胞所懷念的祖國祝福！

事實上的三權

關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的重要特點，我在『讀蘇聯新憲法草案』那篇文章裏已有過大概的評述了。在那新憲法裏，蘇聯公民所享受的基本權利不止三種，但是尤其使我們感到濃厚興趣的是工作權，休息權，和教育權。這些新名詞已夠新奇，但是這些新奇的新名詞倘若只不過是白紙黑字的東西，在紙面上說得堂皇冠冕，那也不值得怎樣注意，可是這三種權利却的確確是事實上的三權，在新憲法草案未發表以前，就已經在事實上辦到了，這次新憲法草案裏所規定的這三權，只是把事實寫在紙上罷了。這是我前年從英國到蘇聯去考察時所目睹的事實，所以想在這裏就記憶所及，提出一些來談談。

首先請先談工作權。在任何其他國家裏，教育的責任只是弄到你畢業，便算完事，至於你畢業後能否得到職業，這是你自己的事，好像和教育家毫不相干。在這種情形之下，畢業後罷不

能得到一個吃飯地都毫無把握。至於你是否所用即爲所學，那更沒有人顧問了。誠然，在外國或在中國，我們都聽見有『職業指導所』或『職業介紹所』這個東西，這種機關對於介紹職業雖也有一小部分辦到，但對於求業者並不負有必須替你尋得職業的責任；在這鬧着失業恐慌的時代，在許許多多求業者裏面，能夠介紹出去的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在蘇聯，他們並不是把畢業生推出校門以後便不再負什麼責任。在學生將畢業的一年前，假使你是學重工業的，即由你的學校當局，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和你自己，共同商定你的職業，確定你畢業後的位置。蘇聯人民對於研究學問的勤奮，這是任何遊歷過蘇聯的人所承認的。我覺得學了就一定有用，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在他們認爲是當然的，因爲他們承認每個公民都有工作權。

其次請談休息權。蘇聯幾乎已普遍地採用了每日七時制，較繁重的工作已採用每日六時制。僅僅減少工作時間還不夠，他們一方面並在積極增加種種設備，使人民在休息時間得到有益身心的娛樂。我在蘇聯考察所得的深刻印象，覺得他們在工作的時候，無論是工廠裏

的工人或學校裏的學生都是興會淋漓地幹，非常勤奮地幹，但是同時政府却替人民設備種種的正當娛樂機關，使人民在工餘的時候，也興會淋漓地玩，非常勤奮地玩！他們每五天有個休息日，在這一天你可以看到成羣結隊的民衆有的參觀各種博物院，有的遊山，有的在湖裏遊艇，有的在山麓綠茵上跳舞歌唱，有的在大規模的文化休養公園裏遊散，從事於各種各樣的健身運動。各戲院，各電影院，各名勝，都成了民衆的娛樂地。不但成人，就是兒童，也有特爲他們設備的戲院和電影院等等的娛樂處所。除每五日一次的全日休息外，每日工餘也有種種娛樂的設備。你在傍晚，到那裏的公園裏去，可以看到幾十對或幾百對健康快樂的男女在公園裏露天跳舞場上跳舞。有的是集體舞，有的是雙人舞。這些都是白天努力工作的男女公民，工餘自由來娛樂的，當然沒有以營業爲目的的『舞女』。這種種娛樂，有些在各國也是有的，不同之點是在其他地方，只有少數人享得到，在蘇聯却是大衆所共同享得到的。此外，工作者無論是工人或是職員，每年除休息日外，還有一星期到一個月的例假，依工作的辛苦，成績的優劣而定，在例假期中，不但工薪照給，工作成績特優者還可免費旅行或送到名勝的休養

院去休養全國各名勝都布滿了休養院。（他們稱爲 Rest Home），給大衆免費休養！我在蘇聯的時候，參觀了不少這種休養院。所以他們的所謂休息權，並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話，却是實踐的記載。

最後我們要談到教育權，就其他各國的情形說，做家長的人對於子弟教育費的負擔，大概都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尤其是收入少的人們。子女在小學時代，父母的負擔還輕些，到中學時代已較重，到大學時代就更重，顯然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家長所能勉強負擔的。你能受到多少教育，就全視你的父母有多少收入，收入不一定，你的教育也就毫無把握。在蘇聯的實際情形却不是這樣。他們的小學中學及大學都是免費的，但是在小學中學時代，衣食住及零用等還由父母供給，做父母的還不能完全脫卸護養的責任。到了大學，學生的費用比較的大些，依別國的情形，父母的負擔也比較的增加起來，在蘇聯對於大學生却有國家津貼的辦法。年級愈高，津貼也隨着增加；成績愈優，津貼也酌量增加。大概大學初年級學生每月可得津貼一百羅布左右，以後依年級遞增，最高的可得津貼二百羅布左右。他們完全可以自願，做父母的完

全可以不負責了。研究院裏的學生每月津貼有到三四百羅布的他們對於大眾的教育積極推廣和提高，如不這樣給人以便利，大多數民衆的子女便沒有機會受到高深的教育。除大學外，各工廠裏的藝徒學校和工人升學預備科等等，不但免費，也還有相當的津貼。在蘇聯，只要你學肯學，就不怕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所謂教育權，也不是一句裝飾門面的話語，也是在事實上已經辦到的事情。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總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一個人所承認的理論和他的行為之間有必然的關係。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實踐不會和他的理論發生矛盾，却是說倘若這兩面有了矛盾，必有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最簡明的例子是說謊。倘若我說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實際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論和行動之間顯然便發生了矛盾。但是爲什麼有這樣的矛盾？這裏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他的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不是理論的，任何有意的說謊，總有一個爲什麼要這樣說謊的實際的理由。有的時候，說謊是出於無意的，說出的話不但欺騙了別人，同時也欺騙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欺自』當然不是出於有意或心裏知道，却是由於不知不覺中受着自己成見的影響，受着潛伏着真正的動機所影響。這種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他們所本

來討厭的人，評判得特別苛刻。他們自以為是在說老實話，而在傍觀者清的我們，却知道他們的偏見是受着他們對於這個人的厭惡心理所影響，而他們的這個厭惡心理却是有着實際的理由，不是理論的。所以理論和實踐的聯繫並不是說理論和實踐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說這兩面有着必然的關係；倘若這兩方面發生矛盾的時候，必然都有着實際的理由。換句話說，理論常為實踐所決定。

這樣看來，一個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認的所信仰的東西，未見得就是真正信仰的東西，甚至有許多人自己還莫明其妙，不覺得自己是在欺騙自己！但是遇着這樣的情形，我們怎樣能判斷這個人究竟真正信仰什麼呢？我們不能根據他所說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須觀察他在行動上所表現的是什麼。我們如看見任何人的行動和他所自認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斷他並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認的原則。你如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麼，你必須研究他的行動上的表現，不能僅靠研究他說些什麼或想些什麼。

這個原則似乎是很簡單明瞭，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如把這個基本原則應用於實

際，便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們對於任何政黨，或任何集團，或任何個人，不能僅看了他們嘴上所承認的黨綱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確的，必須堅持地把他們所自認的理論和他們在行動上的表現比較比較。你如果要知道一個政黨究竟代表了什麼，你必須很不怕麻煩地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究竟是什麼。例如有自命什麼主義的政黨，我們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不但不能實現它所標榜的主義，而且是反而要阻礙這個主義的成功，那末我們便可斷言這個政黨不是這樣主義的政黨。不但如此，我們發現理論實踐不符的時候，還要研究這裏面所潛伏着的實際的理由。你並且可以發現這個實際的理由總是含着有欺騙的作，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自覺的，或是出於無意的，不自覺的。因為決定這個政黨的行動是有它的真正的動機，不是該黨所承認的動機，無論這真正的動機是否主持該黨者所自覺，但是對於一般人是具有欺騙的作用却是一樣的。行動既然決定理論，我們要信任任何政黨，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他們說要做什麼，或想要做什麼，却是在實際上他們做什麼。不但我們對於任何政黨要這樣，對於任何集團或個人的觀察，都應注意這基本的原則。

實踐決定理論。真正的理論也有着領導行動的功用。所謂真正的動機，和僅在表面上標榜着而實際和實踐不符的理論或動機不同。是指真有領導實際行動的理論或動機。雖則在行動者的本人有的自覺，有的不自覺。倘若一個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動機所在，那末他的行動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動有着很大的危險性，因為理論是實踐的眼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论來做行動的基礎，同時要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真理

真理永久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這句話初聽似乎頗不易懂，因為我們想起『真理』這個東西來，第一個印象便容易連繫到抽象，覺得真理和具體並沒有連在一塊的必要。例如現在有些人跟着人喊『禮義廉恥』以為這是真理，是『行之百世而不惑，施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原則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便是抽象的，不必有具體的聯繫。

可是憑空問我們該不該有『禮義廉恥』，這個問句却不很容易回答；照一般人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應是毫無疑慮的『是』。因為就抽象的原則說，誰敢說一個人不該有禮貌，不該有義氣，不該廉潔，不該知恥？但是倘若我們問一問中國在當前是在什麼時代，是在怎樣的境地，以及所謂『禮義廉恥』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便大有研究的餘地，不是含糊的概括的『是』或『否』的答語所能回答的。中國當前是在受着民族敵人的瘋狂的侵略和民族危

機迫在眉睫的時代，全國大衆所急迫要求解決的大問題是集中火力立刻發動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在這樣嚴重形勢之下，土地一天天被敵人不費力地宰割，人民一天天被敵人無限制地蹂躪，在平日昇平世界所無妨從容高談的『禮義廉恥』，在這個時候和這個境地便不該再那樣從容高談着。況且就是講義講恥罷，在此時此地應講的義，應講的恥，應該是不容坐視民族的淪亡和人民的遭受摧殘，否則便是大不義，最無恥！而在事實上所提倡的所謂『禮義廉恥』，却是在民不聊生的時候，叫你怎樣要端正帽子，扭好鈕扣，見面要問聲『你好』的玩意兒！可見僅就抽象方面空談什麼禮義廉恥，是得不到正確的判斷，一加上具體的研究，便可瞭如指掌了。

在西歐各國遊歷的時候，看到中國人在國外的情形，使人感覺到我國人不修邊幅的習慣隨處可見。例如你在那裏的街車上遇着的外國人，可以看見他們總是頭髮修得整整齊齊，鬍子括得光光的，但往往可以遇到中國的乘客鬍子留得『荊棘滿地』，蓬着一頭顯然一兩個月不剪的頭髮。外國人見着中國人的一舉一動，往往就看作中國人的代表型，認為凡是中

國人都是一樣，所以看見幾個人不修邊幅，便以為凡是「柴納門」都是不修邊幅的。中國人的不修邊幅，還有人認為是可以做人的名士派的丰采，在西洋人却認為這是齷齪的表現，野蠻的象徵。你在倫敦街道上看見雙手捧着火柴盤的叫化子，也可以看到他也盡力使衣服刷得乾乾淨淨，皮鞋刷得光溜漆黑，頭髮梳得光溜溜，鬍子括得精光。我們因知道有着這樣基本觀念的差異，我們在國外遊歷的人，想到中國人在外的體面，總希望在國外的我們的同胞不要給人輕視，對於衣冠整潔，對嘴吧上和頭頂上的幾根東西多費些工夫產（金旁下仿此）除產除。

一個人該不該修邊幅？倘若我們不把「齷齪」認為可以使自己和別人感到愉快的東西，這問句的答案無疑地是個「是」，但是說來奇怪，近來在歐洲你可以遇到思想比較前進的人們，對於過分講究邊幅的習慣已引起了多少的反感。這並不是說他們贊成蓬首垢面的人們，中國名士派的齷齪習慣，却是因為在他們的社會裏過分講究邊幅的習慣含有不同階層的意識形態，所以熱心變革運動的人們對於這種過分的習慣無意中引起了反感。例如他們看

戲坐前排的一定穿禮服，到講究餐館裏晚餐的一定也要穿禮服，種種繁文縟節，都不過是那些特權階層玩的把戲，使平民階層隔離開來，造成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因此你可以看到他們裏面思想比較前進的人們，對這些像煞有介事的擺臭架子的舉動，亦有厭惡鄙棄的心理。這種情形，也不是抽象的原則所能解釋的，也是要就他們所屬的時代和境地的具體條件才能解釋的。

個人的美德

有一位老前輩在某機關裏辦事，因為他的事務忙，那機關裏替他備了一輛汽車，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想念到中國有許多苦人，在俄寒中過可憐的日子，覺得非常難過，已把汽車取消，不再乘坐了。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說改造社會，要以身作則，他這樣做是要把自己的儉苦來感化別人的。我說我很懷疑這種「感化」的實效究竟有多少，因為許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車，用不着你去感化；至於上海灘上的富翁闊少，買辦官僚，決不會因為你老不坐汽車，他們也把汽車取消。就是我這樣出門只能乘乘電車，或有的地方沒有電車可乘，因為要趕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當牛馬的黃包車，也無法領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聽了沒有話說。

就一般說，這位老前輩算是有着他的個人的美德，但他要想把這「個人的美德」的「

感化』作用來『改造社會』便發生我在上面所說的困難了。他真正要想改造社會，便應該努力促成一種社會環境，使白坐汽車的剝削者羣無法存在，勞苦大眾在需要時都有汽車可坐，這才是根本的辦法；但是這種合理的社會環境是要靠集體的力量實際鬥爭得來的。決不是像『取消汽車，不再乘坐』的『個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羨稱列甯從革命時代到他握着政權以後，只有着一件陳舊破爛的呢大衣，連一件新大衣都沒有，歎為絕無僅有的個人的美德，好像想學列甯的人只須學他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便行！其實列甯並非有意穿上一件破舊的大衣來『感化』什麼人，他的偉大是在能領導大眾為着大眾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却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無意中始終穿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為解放大眾所積極進行的工作，而僅僅有意於什麼個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於上面那位老前輩的感化論了。無疑地列甯決不是要提倡穿着破舊的大衣，他所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勞苦大眾不但無須穿着破舊的大衣，而且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着着成功，大家還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在德國的時候，聽見有人不絕口地稱讚希特勒的儉德，說他薪俸都不要，把它歸還到國庫裏。我覺得他的重要任務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決德國人民的經濟問題，是否有益於德國的大眾，倒不在乎他個人的薪俸的收下或歸還。老實說，像我們全靠一些薪俸來養家活命的人們，便無從領受這樣『個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反對個人的美德，更不是說奢侈貪污之有裨於社會，不過鑒於有一班人誇大『個人的美德』對於改造社會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對於改造現實所需要的積極的鬥爭。

事實的表現

事實勝雄辯，因為只有事實的表現是最無可逃避的證據。

各國的政黨，除真正由大眾做中心的政黨外，你如拜讀他們的黨綱，宣言，以及他們的『領袖』的公開演說，未嘗不是爲國爲民，說得娓娓動聽，但試按他們在事實上的表現，『爲』的是誰的『國』，所『爲』的是什麼『民』，就要露出狐狸的尾巴了。例如英國的勞工黨的領袖們在嘴巴上唱着『社會主義』，實際上却採用妥協的途徑，欺騙羣衆的方法，事實上的表現，便是很可笑的。他們秉政的時候，孜孜矻矻的是如何減削失業救濟金，（他們所謂『Dole』），如何減削工資，和如何壓迫工人反抗的幾件大事！（在萍踪寄語第一集裏有較詳的論述。）關於他們的『德政』，還有一件小事也頗有趣。倫敦密布地下的地道車原來是由七個公司『割據』着的，他們心血來潮，想起了有計劃的經濟統制是『社會主義』的精髓，要

把這些地道車『統制』一下，把七個公司合併起來，叫七個公司原來的股東把股票交還，重新發給一個總公司的股票，由市政府派一個大員做總經理，積極實行『合理化！』結果，原來在七個公司裏做工的職工在某一公司失了業，還可到另一個公司去混飯吃，又因各公司的對立與競爭，罷工的效力也大些。這樣一來，職工們只有一條路走，除『埋頭聽榨』外，要想奮鬥，比前更難了！而老闆們却可因統一的『合理化』而沾光不少。所以『社會主義』其名，而『法西斯化』其實，但是我們如注意他們事實上的表現，便不致受他們的欺騙。其實帝國主義的國家對內榨取勞工大眾的骨髓，對外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的膏血，這是事實上的表現，他們在表面上儘管說得怎樣冠冕堂皇，是沒有用的。

蘇聯是含有百餘種民族的國家，在帝俄時代有許多民族是遭受着種種壓迫。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特別注意他們對於這些從前遭受壓迫的民族，現在事實上的表現怎樣。我因為借同美國學生旅行團參加過莫斯科暑期大學，認識不少蘇聯的學生，其中有許多是屬於從前被壓迫的民族的，當和他們在私人房間裏密談到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享受教育的種

種權利上，在參加政治的權利上，在享受經濟的種種權利上，各民族都是一律平等，找不出有什麼兩樣，有的只是在他們的特別落後的民族裏，社會事業的建設費文化的推廣費特別比別處加多些。我後來到蘇聯中部南部看到的種種事實（以後當陸續詳談）知道他們的話不錯。例如蘇聯的各大學不但免費，而且按月有津貼，我問過許多學生，不管他們是屬於那一民族，都受同樣的待遇。又例如在各工廠裏所見，廠長和工程師的重要位置，也有不少是出身從前被壓迫民族的。在各地方的政治機關裏，也有同一的現象。這種事實的表現其實也不足奇，因為帝國主義的榨取是發源於資本主義榨取制度的存在，在榨取制度不存在的社會裏，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帝國主義』這個寶貝根本沒有存在的餘地了。（這當然不僅指蘇聯，在任何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這樣。）

大眾的軍人

本刊很榮幸地登載過兩位曾爲民族解放英勇抗戰的名將的文章。一位是馬占山將軍，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我的禦海經驗與認識（見本刊第七期）；一位是翁照垣將軍，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一二八四週紀念的感想（見本刊第十一期）。這兩篇是承蒙兩位將軍自動投寄本刊的，內容都是他們根據親歷的實際經驗證明中國在軍事上確有抵抗自衛的能力，這在救亡運動中是有着非常的重要性的文字，是不消說的。馬將軍孤軍抗敵，能支持到兩個月；翁將軍也以孤軍抗敵，能支持到一個多月。在中國廁身軍界，號稱「將軍」的有如過江之鯽，假使有十來個像兩位將軍的英勇抗戰，至少有三年的抗敵激戰，任何強悍的帝國主義，都不能不崩潰的，還能那樣不費力地把中國的土地一大塊一大塊地宰割，幾去了全國版圖的一半，而還在繼續不斷地進攻嗎？我們倘追念兩位將軍的戰績，對於現在國土被人宰割了幾乎

一。半。的。時。候。還。在。唱。着。『。準。備。』。和。『。等。待。』。的。調。兒。以。欺。騙。民。衆。不。必。再。有。什。麼。解。釋。即。可。明。瞭。的。了。

自。從。這。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發。表。之。後。國。內。外。的。中。國。大。衆。寫。信。給。本。刊。慰。問。兩。位。將。軍。並。希。望。兩。位。將。軍。還。要。奮。起。爲。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有。如。雪。片。飛。來。應。接。不。暇。我。們。實。不。勝。其。轉。達。或。轉。交。所。以。特。在。這。裏。順。便。提。起。以。告。兩。位。將。軍。同。時。敢。告。熱。心。的。讀。者。諸。君。我。們。深。信。兩。位。將。軍。必。能。始。終。爲。民。族。解。放。作。殊。死。戰。必。不。辜。負。諸。君。的。殷。切。盼。望。的。在。我。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就。是。看。到。大。衆。方。面。對。於。真。能。爲。國。抗。敵。的。軍。人。這。樣。熱。烈。誠。懇。地。尊。崇。愛。護。可。見。大。衆。的。軍。人。——爲。大。衆。利。益。而。出。生。入。死。英。勇。抗。戰。的。軍。人。——必。爲。大。衆。所。認。識。的。必。爲。大。衆。所。不。能。忘。的。

我。對。於。這。兩。位。『。大。衆。的。軍。人。』。雖。都。不。過。見。過。一。面。但。所。得。到。的。使。我。永。不。能。忘。的。深。刻。的。印。象。是。他。們。的。熱。誠。血。性。肝。膽。照。人。馬。將。軍。於。嫩。江。戰。後。第。一。次。到。上。海。會。和。杜。重。遠。先。生。一。同。到。生。活。週。刊。社。來。看。我。臨。別。時。和。我。們。社。裏。每。一。個。同。事。都。握。手。致。意。他。對。我。們。這。班。『。傻。

子』的和藹的容態，誠懇的言辭，是我們所永遠不能忘的。據我們所得到的最近消息，馬將軍對國事的憤慨，急得連夜睡不着覺。

翁將軍，我去年到莫斯科的時候才見面。我在戈公振先生處碰着他，承他叫我到他的旅館裏去同吃晚飯，暢談了許久，他無時無刻不以爲國犧牲爲念。我那天夜裏就要乘車回列甯格勒，再乘輪回倫敦。臨行時他覺得我衣服太薄，把他在吳淞苦戰月餘始終穿在身上的羊毛衫（即西裝馬甲上用的）贈送給我，說『我原打算和這件衣服同生死的，現在送給你作紀念吧！』我很欣幸的受了下來，說這是在民族解放戰爭史上很可紀念的一件寶物，我不敢佔爲私有，謹爲暫時保存，等到中國民族解放成功，建起了民族解放博物館時，還要代爲送去陳列起來，作永久的紀念。

有朋友告訴我，最近翁將軍因看了本刊裏所詳載的學生救亡運動的英勇犧牲，想到軍人對於衛國的職責，痛哭了一夜。

我們對於『大衆的軍人』還要爲大衆做前鋒的『大衆的軍人』敬致民族解放的敬

禮希望他們對民族解放作再接再厲的努力

矛盾和一致

歐美各國的大衆最近有兩個『反』的運動：一天堅強一天，一個是『反戰』運動，一個是『反法西斯』運動。其實這兩個運動也可以說是一個大運動的兩方面；法西斯對內是壓迫勞苦大衆，對外是不恤用殘酷的戰爭來掠奪殖民地，所以在國際上，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分離不開的。掠奪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只是各帝國主義的統治階層（做政治後台老闆的資產階層都包括在內）各爲本階層牟私利的勾當，不但和各該國的勞苦大衆沒有什麼利益，而且於他們還有很大的損害。一則因爲有殖民地供帝國主義的統治階層所利用，適所延長剝削制度的命運，使勞苦大衆多延若干時的痛苦；二則因爲帝國主義的戰爭一旦爆發，輪到前線去拚命做炮灰的不是坐享剝削所得的大人先生們，却是白送命的勞苦大衆。這樣看來，法西斯所推動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對國際而發，和對內方面的壓迫勞苦大衆也

是拆不開的。

前次世界大戰，參戰的各國高唱『爲保障世界民主』而戰（'t）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實際是驅着無辜的大衆替統治階層分割殖民地而戰！自世界大戰以後，又經過世界經濟恐慌，各國大衆白吃苦頭，已有深刻的覺悟，知道拚着命所『保障』的只是資產階層的利益。他們自己是完全上了大當。最近各國大衆『反戰和反法西斯』的日益猛烈，都是由於受着這種現實的教訓。各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有着這樣無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統治階層對於掠奪殖民地的殘酷戰爭兇橫猛進，一方面國內大衆『反戰和反法西斯』的狂潮也衆怒難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各國大衆必然地不像前次大戰裏那樣的易於受欺騙了。各帝國主義的當道，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却高唱和平，也未嘗不是有着這樣的顧慮。但是因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他們將終於不得不冒險來它一下。

在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除少數漢奸和準漢奸外，却有一致對抗壓迫者的潛力；無論什麼階層，無論什麼政治派別，做亡國奴總是不願意的，做被征服的民族中的一個。

奴隸總是不願意的，在這一點上便有結成聯合戰線的可能，在這一點上便沒有侵略國內部的。那個矛盾，在這一點上便是一致的。在侵略國有那樣的矛盾，在被侵略者有這樣的一致，以這樣的一致和那樣的矛盾對抗，最後的勝利誰屬是很顯明的。

但是這樣的一致所以能發生力量，必須在發動了民族解放戰爭以後，否則侵略國反可以因被侵略者的無限退讓而維持它的對內的壓迫力量，同時對侵略國能繼續不斷作不費力的掠奪。

糟塌

糟塌是反動派的慣技！

例如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便極盡糟塌的能事。他們當然不是『爲糟塌而糟塌』，却有他們的動機。他們因爲要欺騙麻醉本國的民衆，使本國的民衆覺得本國統治者羣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行爲是應該的，是正當的，是『傳布文明』的，就不得不用種種的宣傳方法，把那些地方的人民形容得異常野蠻，異常殘忍，異常愚蠢，異常可惡。在倫敦有個獵人館叫做杜索夫人展覽會 Madane Tussaud's Exhibition 在地窖裏設有所謂『恐怖室』，懸有殺頭的慘相，上面赫然用大字題着『在中國的殺頭』。（該處爲倫敦名勝之一，看的人很多。）我們固然不擁護殺頭——雖則殺盡漢奸的頭却是痛快的事——可是好像殺頭這件事只存在於中國，用這樣的布置來暗示人中國特別殘忍成性，顯

然地存着糟場中國民族的用意我在倫敦時各報正紛載希特勒殺兩個美麗的本國女偵探的頭但是那個『恐怖室』裏並不懸上一個『在德國的殺頭』的相片似乎只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活該受這類的糟場他們以為盡量地糟場被壓迫的民族可以永遠使被壓迫者處於奴隸的地位其實被糟場得越厲害力爭解放的情緒也愈迫切

舊制度的國家的統治者羣對於新制度的國家也極喜用他們的宣傳工具——報紙和雜誌——痛做糟場的工夫。你在西歐各國的報紙和刊物上常常可以皆到糟場蘇聯的種種『新聞』在蘇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集體農場大告成功，農產品日見豐富的富兒，他們竟敢閉着眼睛大造蘇聯農民救千整萬餓死的消息！但事實勝雄辯，到蘇聯遊歷的人一天多一天，他們的造謠徒然損失自己的信用罷了！倫敦最反動的報紙之一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除常常造謠誣蔑蘇聯外，還常常登載攻擊蘇聯袖們的私生活的消息。我到蘇聯仔細調查後，知道都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謠傳，都是有意的糟場。其實蘇聯新社會建設的突飛猛進，蘇聯領袖們領導蘇聯大眾對於新社會建設的繼續努力，都有事實的表現，並不受這

樣糟塌的絲毫損傷。

上面所說的是國際上常見到的一種怪現象。但是在一個國度內，反動者羣也喜歡用這同樣的手段。他們對於新運動，想出種種糟塌的『新聞』，盡量宣傳，使人覺得除了『殺人放火』、『洪水猛獸』的印象外，無一是處。他們對於所欲得而甘心的個人，也慣用這同一的『技巧』。由他們直接間接的走狗們造出種種謠言攻擊他的私生活；盡瘁於社會事業的人無論怎樣艱苦，只須他的事業不便或有礙於反動者羣的利益，他們便可造謠誣他怎樣『收入巨大』，怎樣『服飾華貴』，乃至怎樣『舉動腐化』。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他在民衆間失却信用，便可替他們的主子拔去一個眼中釘，是多麼好的策略！我知道朋友裏面因努力於民衆的工作而受到反動者羣的糟塌暗箭，不乏其人。糟塌者心勞日拙，終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其實只須自問沒有假公濟私的虧心事，自問確是以赤誠努力於所認為有益於大衆的事業，不但怕什麼，而且要更勇敢地往前幹去。

領導權

近來常聽見有人提起『領導權』這個名詞，也常聽見有人說某某或某派要搶領導權云云，好像領導權是可由少數人任意操縱，或私相授受似的。這種人的心目中所認為領導權，只想到領導者，只知道有立於領導地位的少數個人，把大眾拋到九霄雲外！於是他們便存着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以為領導權是從少數人出發，大眾只是受這少數人所『領導』。隨着這個錯誤的觀念，他們又有着一個很大的誤解，常常慨歎於中國大眾的沒有力量，夢想着好像可以忽然從天空中掉下來的『領袖』，然後由這個『全知萬能』『生而知之』的『領袖』來『領導』大眾，以為大眾只配受這樣高高在上和大眾隔離的『領袖』所領導！

其實領導權在表面上似乎是領導着大眾，而在骨子裏却是受大眾所領導，大眾才是領導權所從來的真正的根源。

我在莫斯科時細看他們的革命博物館看到革命進程中每一個運動的事實的表現，都覺得領導中心之所以偉大，全在乎能和當時大眾的要求呼應着打成一片。換句話說，領導中心是受着大眾的領導，也只有受着大眾領導的中心才能成其爲領導中心。

誰都不能否認列甯和他的一羣是蘇聯革命的領導中心。他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革命時所提出的標語是土地、麵包、和平。當時克倫斯基政府無力應付經濟危機，仍和協約國進行帝國主義爭奪的戰爭，對於民生的艱苦，農民土地問題的急切待決，都毫不顧及，而列甯在當時所提出的三大主張：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不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恰恰反映着當時大眾的迫切要求；接着主張『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又是達到這三大主張的唯一途徑。列甯在當時能根據大眾的真正要求和可以達到這真正要求的途徑努力幹去，這不是很顯然地是受着大眾所領導嗎？這不是很顯然地表示他的領導權不是和大眾隔離，而是發源於大眾的嗎？所以在表面上列甯和他的一羣似乎是在那裏領導着大眾向着正確的路線前進，而在骨子裏却是他和他的一羣受着大眾的要求所領導而向前邁進着。他的偉大是在乎他能認清

大衆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衆要求所必由的正確路線並不是離開大衆而能憑着什麼領導權而幹出來的。而且在他認清大衆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衆要求所必由的正確的路綫後，也還要靠着大衆自身的共同奮起鬥爭的力量而才能獲得成功的，並不是拋開大衆的力量而能由少數人孤獨着幹得好的。其實果然能依着大衆的要求而努力的，決不會得不到大衆的共同奮鬥的力量；怕大衆力量抬頭，用種種方法壓迫大衆力量的抬頭，正足以證明這些人爲的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一羣的利益，所以提防大衆如防家賊似的！和大衆既立於相反的地位，摧殘蹂躪大衆之不暇，還說得上什麼領導大衆呢？果要領導大衆嗎？必須受大衆的領導！

社會的成份

我曾在上期本刊裏提起在蘇聯所看到的在各種機關的組織方面所特別注意的『社會的成份』。他們要注意在組織方面所包含的分子有百分之幾是工人或工人的家庭出身的，有百分之幾是農民或農民的家庭出身的，有百分之幾是僱員出身的。蘇聯在現階段是工人的國家，換句話說，政權是握在勞工羣的掌握中，執行他們造成沒有階級的自由平等新社會的歷史的使命；爲要鞏固這先鋒集團的組織以完成他們的歷史的使命，所以對於組織方面，大至一黨，小至一個小機關，對於所謂『社會的成份』，都加以嚴重的注意。他們在現階段內，要使『社會的成份』特別偏重於工人或工人家庭出身的份子，（通常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次輪到農民或農民家庭出身的份子，（通常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再次才輪到僱員。（通常達到百分之十左右）。就黨員而論，工人要加入黨做黨員，只須經過幾個月的『試驗』。

(on probation) 期自由職業若要加入黨做黨員就須經過幾年的『試驗』期。(在『試驗』期內，言語行動及實際工作，都受黨的詳慎留意和監察，認為無愧於黨員資格後，才許正式入黨。) 加入黨的人是下犧牲的決心，為新社會努力苦幹的，並不是來享受什麼權利。例如工廠裏的工人已加入黨的，要現出特優的工作成績，於應有的工作外，還要用餘暇來熱烈地參加公益的事業，工資和通常的工人却是一樣的；學校裏的教員已加入黨的，於原有功課之外，夜裏往往要盡義務指導補習教育或其他文化工作，較一般未入黨的教員特別的辛苦，而薪俸却是一樣的。(做工廠的經理或高級職員，如係黨員，薪水要比一般的同等地位的人減少。) 得參加新社會更辛苦的先驅工作，在他們是莫大的榮譽，但是他們所以有這樣的精神，大部分是靠他們有較嚴密的組織，是靠他們有比較健全的『社會的成份』。

這種『社會的成份』的比率，當然依着新社會建設的逐漸成功而演變的。例如蘇聯自從集體農場計劃成功以後，農民也一掃他們從前自私的成見，成爲新社會的集體工作者的分子，新憲法裏也就增加了他們的代表權了。

他們對於『自由職業者』限制特別嚴，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小資產階層』最易動搖，最易反叛革命，只有完全克服了『小資產階層』的自己意識，在大眾領導之下，以大眾的意識爲意識的『知識分子』才能有貢獻於大眾的革命。這樣看來，有人憑空說社會革命是要打倒『知識分子』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應被打倒的是反大眾的，妨礙革命的，做反動走狗的『知識份子』，不是忠實地熱烈地加入大眾領導之下來努力工作腦力工作者。在帝俄時代。在俄國革命初期，『知識份子』大多數是當時腐化制度的擁護者，誰能信任他們？現在蘇聯的自由職業者已是立在勞若大眾一條戰綫上努力工作，所以他們所得到的待遇也和從前不同了。

羣

一個人的思想言語行動，你如果僅從他個人的觀點看去，往往得不到澈底明確的了解，因為任何人的思想言語行動都受着他所屬的那個羣的影響，或受着他所效勞的那個羣的影響。你如能注意到他所屬的羣，『思過半矣！』在國外視察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各方面的實況，仔細分析，在表面上所見的雖是某某個人，在骨子裏都不過是這一羣的代言人，或那一羣的代言人。例如德國的『納粹』領袖希特勒，有許多人覺得不解，他在黨綱裏明明說要把大企業歸國有，以『國家社會主義』自命，而上台後，却一個字不能實現，反而請着十二位剝削統系中的『大王』統制全國的各工業部門，壓迫勞苦大眾，爲資產者羣效勞。其實希特勒根本就是這些『大王』的那一羣的代言人，爲的就是這一羣的利益，黨綱上的話不過是在未上台前用欺騙手段，來獲得一部分受欺騙的民衆的擁護罷了，有

什麼可怪！墨索里尼的後面有他所效勞的羣，包爾溫後面有他所效勞的羣，羅斯福後面也有他所效勞的羣。

資產者羣爲着資產者羣的利益而掙扎，勞苦者羣爲着勞苦者羣的利益而鬥爭，這在各羣裏面的人看來，各都覺得自己是對的。在爲資產者羣供奔走的鷹犬，在勞苦者羣看來是該死的傢伙，而在他的本羣的人看來，却是不折不扣的忠臣，這樣看來，抽象的說這個人怎樣興奮，那個人怎樣能幹，乃至怎樣忠實，都做不得標準，因爲先要問他所效勞的是那一羣？他所關心的是那一羣的利益？效勞於剝削者羣的人愈勤奮，愈能幹，愈忠實，在被剝削者羣方面却愈是更大的敵人。又例如教育家，大概沒有不以「樂育英才」自慰的罷，但是他所「樂育」的是替剝削者羣造奴隸或鷹犬呢？還是替勞苦大衆造鬥士呢？這裏面就大有「差以毫厘，謬以千里」的區別了。

蘇聯在現階段是工人的國家，這是大家知道的。我在蘇聯視察各種機關——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等——的時候，最感興趣的是他們有所謂「社會的組合」(“Social compo-

ation”)更明白些或可叫做『社會的成份』例如他們在一地所舉出的市政府，或任何代表機關，或一個學校，都要注意其中的成份有百分之七十或八十是工人或工人的家庭出身的，此外有百分之二十都是農民出身，百分之十左右是僱員出身（近於他國的小資產者羣）他們認為在現階段中這種『社會成份』的工人比率愈高，愈是健全，否則須有整頓的必要。這是他們在現階段中鞏固工人羣以執行歷史使命而建設新社會的辦法。他們這革命先鋒的羣的組織怎樣注意嚴密，怎樣提防各種機關裏『社會成份』的不健全，以免妨礙新社會的建設工作的確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羣的力量是很大的，大眾的羣不嚴密，營壘不嚴整，反大眾的羣爲着他們本羣的利益便要乘機破壞的。

躲

在倫敦的時候，有一夜在一個中國菜館裏吃飯，這菜館裏有兩個妙齡女侍者，她們都是所謂『土生子』，即她們的父親都是中國人，母親都是英國人。在倫敦華僑居住的地方也在以貧民窟著名的東倫敦，那地方統稱為 Limehouse。在倫敦說起 Limehouse，英國人總以為那便是中國的象徵。聽說在勞工黨未上過台以前，在那個地方走在街上的中國人，任何英國人無故可以打他的耳光！他當然沒有別的什麼罪狀，有的只是因為他做了沒有祖國保護的中國人！勞工黨上台以後，因為比較地還以勞工利益為標準，一般人對於做工的華僑，沒有像從前那樣賤視，雖然有時還不免要把他們歸入『劣等民族』看待。這兩個妙齡女侍者更是出身於 Limehouse，她們雖一半是英國種，但是因為有一半是中國種，在以『優越民族』自豪的盎格羅薩克遜看來，仍然是屬於『劣等民族』，所以她們對於沒有祖國保護的

中國人所受到的種種切膚之痛，是親身經歷過，至少是常常耳聞目睹的。

這個晚上，我一面獨自一人吃着飯，一面無意中竊聽到這兩個十八九歲的天真爛漫嬌態可掬的女侍者同立在一個角落裏輕聲低語着。她們生長在英國，說得一嘴的流利悅耳的英語。甲女睜着那一對亮晶晶的眼睛，好像有着滿腔心事似的，低聲軟語，問着乙女道：「爲什麼任何壞的事情都歸到『柴納門』身上來？我真不懂！」乙女懶洋洋地微歎着答道：「我也不懂！我想我們不要再住在英國了，我們還是躲到自己的『柴納』去吧。」她們剛說完這幾句話，有兩三個盎格羅薩克遜的客人進來了，她們忙着拿筴匙，捧碗碟，跑去招呼着客人了。

她們說完算了，但是却使無意竊聽到這幾句話的我，無限感喟，久之仍像那幾句話還在我的耳鼓裏震盪着。她們一出世睜開眼睛，看見的便是英國的環境，『柴納』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在她們是莫明其妙的；她們略大之後，進的學校也是英國式的學校，受着『上帝佑我王』的教育，中國有了什麼歷史，中國的近代史上面載着多少的恥辱，在她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們感覺到在國外受到種種的歧視的侮辱和苦痛，直覺地想到的第一個念頭，便是

「躲到自己的「柴納」去吧。」

但是她們絲毫不知道，我很慘然地覺得她們一定絲毫不知道，在中國仍然是無限忍辱含垢的中國的時候，我們在世界任何天涯地角固然都無處躲，就是回到中國，回到受着重重壓迫的無限屈伏恬不知恥的中國，又有何處可躲？

由東北「躲」到華北，由華北「躲」到華南，由華南再「躲」到何處去呢？況且不是人可由東北「躲」到華北以及華南嗎？在奴隸的國家（？）就只有做奴隸的份兒，誰也無法「躲」，誰也無處「躲」！你真要「躲」嗎？唯一可能的方法只有根本把無限屈伏恬不知恥的國家（？）一變而為英勇鬥爭力圖雪恥的國家。

我們的

有一位朋友也曾經到過蘇聯去看看，他後來對人說蘇聯也不過是國家主義！有人問他何以見得，他說他在蘇聯參觀的時候，引導的人不是說這種工廠是我們的國家裏所有的，算世界上第一，便是說那種機器是我們的國家裏所有的，算世界上第一，這顯然可見他們也處處想到『我們的』國家，這不是國家主義嗎？

這種話在表面上很容易淆亂黑白，引人誤解，其實他沒有注意到國家主義和愛國是兩件事，更沒有注意到這裏所謂『我們的』國家是含有重要的意義。近代的國家主義是民族資產階層利用國家這個機構來和別的民族資產階層來競爭市場和利潤的，結果是要走上帝國主義的一條路，（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由種種原因而民族資產階層無法抬頭，雖欲走上這條路而不可能，這是另一問題，這裏不贅述了）和愛國是截然兩件事情。至於蘇聯的人民

把蘇聯看作『我們的』國家，那也不是怪，因為他們的國家的確是爲大衆謀福利的。屬於大衆的國家，大衆把他看爲『我們的』，這不是很當然的嗎？在帝俄時代，那時他們決不會說那是『我們的』，因為那時的俄國只是俄皇、貴族、僧侶、地主和資本家的少數特權階層的國家，大衆只是有做變相的奴隸的份兒，他們當然不能把那時的國家看作『我們的』。他們在革命後，使少數人的國家一變而爲大衆自己的國家，這誠然是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因為這是爲人類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人類真正歷史的開始！

我在莫斯科時曾看到他們努力新社會建設的影片，（影片名列甯的三歌，內容非常雄偉，新社會建設的影片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最使我感動的，是工廠的工人演說時，提起工廠，便說『我們的』工廠；農場的農婦演說時，提起農場，便說『我們的』農場。這並不是表面的話。這工廠和農場確然不是爲任何少數個人謀利的，在努力於這種的工廠和農民當然要看作是『我們的』了。蘇聯新社會建設的成功，他們大衆對於新社會建設的興奮熱烈，『吃得苦中苦』而不但無悔無怨無恨，反而高高興興地幹去，與會淋漓地幹去，最基本的的原因還是

在『我們的』這三個字上面。

當然，這裏所謂『我們的』並不是從個人的立場做出發點的說法。從個人做出發點的說法，便含有自私的意味，便含有個人據爲一己所有而不顧公益的意味；這裏所謂『我們的』是指大衆而言，是指和少數特權的剝削階層相反的大衆而言，是含有社會化的重要意義，是含有勞苦階層的集體的重要意義。

倘若一個國家還不爲大衆所有，那末事事都和大衆的意志或利益立於衝突或敵對的地位，甚至你要愛國不許愛，要救國不許救。在這樣境地的大衆並不是無須愛國救國，却是一方面要不許少數的漢奸賣國同時要努力使國家成爲真是大衆的國家，成爲『我們的』！

柴納門

我從倫敦乘蘇聯的輪船往列甯格拉的時候，海程經過五天，在這五天裏面，每天都有一次討論會。同船的有兩百多個旅伴，大多數是從美國往蘇聯，由倫敦經過的，有少數是由倫敦同去的英國男女。有一天剛要舉行討論會以前，有一位美國旅伴跑來對我說，在這次討論會裏，他們要我報告些關於中國革命的近況。這位旅伴是一個前進的青年，我知道他是沒有種族的成見，但是他却有意避免引起我的種族的成見！他先請我原諒，因為他在談話裏提到「中國人」這個名詞，而在英文裏，「中國人」這名詞却有兩個，一個是「柴尼斯」(Chin-ese)；一個是「柴納門」(Chinaman)；他記得聽人說過，在這兩個英文字裏面，有一個是中國人所要聽的，有一個却含有侮辱中國人的意味給中國人聽了是要不高興的，但是他表示很抱歉地不知道那一個是可以用的，那一個是要得罪的，他老實弄不清楚，請我指示他。

我說只要是出於沒有成見的朋友的嘴裏在我聽來都是一樣；不過也很坦白地告訴他，就一般說，『柴納門』是有人作爲侮辱中國人的稱呼。他聽後還再三記個清楚，似乎有意要牢牢地記着這個區別，以免將來對於其他中國人有唐突的過失。

在國外時，確常遇着很相得的外國師友，我很確然地知道他們絕對沒有侮辱中國人的用意，在談話時也常用着『柴納門』，我因爲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是完全含着好意，並且知道他們絕對沒有侮辱的意思，所以聽着也仍然不以爲意。他們以爲『柴尼斯』是形容辭，意義是『中國的』，『柴納門』才是名詞，更合於用作中國人的稱呼。猶之乎英文的 English 是形容詞，Englirshman 才是名詞。

但是出於死硬派的嘴裏，或出於蔑視中國人的外人的嘴裏，『柴納門』含有侮辱的意味，却也是確鑿的事實。可是我們如仔細想想，顧名思義，『柴納』是中國，『門』是人，『柴納門』的本身原來並沒有什麼侮辱的含意，大概只是『柴納門』自己不爭氣，不振作，使這個原來不含有侮辱的名詞染上了侮辱的色彩吧！倘若這個分析不錯的話，我們的問題便是怎

樣消滅這加上去的侮辱的意義了。

俄國在未革命以前西歐各國以及美國的人們，也把俄國看作半野蠻的國家，俄人是被看作半野蠻的人種。等到革命以後，五年設計劃的逐步勝利，就是死硬派到那裏去旅行觀察一次，也不得不讚歎他們新社會建設的成績，這是我在蘇聯各處遊歷親眼看見的情形，他們雖還不明白蘇聯何以能有這樣成功的基本原因，但肅然起敬，不敢再胡謔什麼「半野蠻」的形容詞到蘇聯人民的頭上，却是無可疑的事實了。

我們果能從困難中爭得民族的解放，雖被人喚着千百聲的「柴納門」何妨？我們被人套上「奴隸」的頭銜，還不知道起來鬪爭，萬邦騰笑，人類唾棄，就聽着「柴尼斯」的呼喚，光榮又在那裏？

有閒

『有閒階級』這個名詞，諸位聽到的想已很多。這個名詞似乎是很令人討厭的。其實有閒階級之所以令人覺得討厭，倒不是『有閒』的本身，是因爲在許多被剝削榨取的大衆終日勞苦而毫無閒暇的現狀下，却讓少數特權階級有着閒暇，形成不公平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講到『有閒』的本身，却是一種極可寶貴的東西。記者在蘇聯視察所得的觀感，一方面覺得他們大衆參加新社會建設工作的努力和緊張，一方面却也覺得他們大衆獲得享受正當娛樂的閒暇。你每日下午在工作時間以後或晚間，如到他們的『文化和休息公園』裏去看看，便可看到於工作餘暇的大衆穿着整潔的新衣，真是『摩肩接踵』地在那裏玩。有的坐在電燈輝煌綠草如茵的廣場上的一排一排的長椅上談心，有的三五成羣地散步，有的看着露天戲台上的戲劇，有的集坐在音樂台的前面傾聽音樂，有的在園內咖啡館裏喝着談着。

公園的數量是常常在增加，而大眾的擁擠却仍是一樣，原因是爲着大眾有了閒，工作愈緊張，則於工作後的休息愈益需要，有閒來恢復精力，以作再進努力的基礎。你到他們的戲院裏去看看，最好的位置並不是像在西歐所見的那樣，是有錢的有閒的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的專利品，却是在工廠裏參加社會主義競賽最有成績的突擊隊隊員，或學校在學業上參加社會主義競賽最有成績的學生的獎勵品。你可在那些最好位置的椅背上看見有亮晶晶的銅牌，上面刻好某某廠特爲突擊隊員定的位置，或某某校特爲最優學生定的位置。你如到他們的各種博物院裏去看看，可看見成羣結隊的粗手粗脚的工人或集體農場的農夫，一羣又一羣地參觀着，聽着指導員口講指劃的解釋。他們每過五天就有一天的休息；在這一天，你隨處可以看見，尤其是在山明水秀或青翠欲滴的郊外村間，成羣結隊的工人大衆，有音樂爲前導，很愉快地邊走邊引吭高歌，盡量使他們的身心獲得舒暢的休養。在學校，在課堂或實驗室裏，他們專心致志地忙得很，在休息日的晚間或特別紀念日的晚間，却有大規模的跳舞會，整千的男女學生在廣大的廳上跳舞，那盡量的快樂的情緒，和在工作時一樣地緊張！我曾和莫斯科

暑期大學的男女同學屢次去參加過精神上所受到的興奮刺激是永遠不能忘的！他們的各機關每年都有兩星期到一個月的休假，免費送到名勝的區域去休養。我到蘇聯南方克里米亞的名勝區域如雅爾他等地，美麗像瑞士的海濱和山麓，來來往往的男女，都是特別努力於工作，在休假中來休養或娛樂的工農。這些事實給與你的異常深刻的印象是大衆的有閒。這不是『游手好閒』的閒，却是於努力工作之後的閒；不是少數不勞而獲者的閒，却是共勞共享的社會裏的大衆的閒。

家醜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家醜不可外揚』。我覺得在國外旅行的時候，常不免懷着這樣的心情。但是最惱人的是你怕着家醜外揚，隨時隨地都要叫你感覺到家醜正被大揚而特揚着。最明顯的是每遇着你看報的時候，沒有關於中國的新聞則已，一有着登載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新聞，不是我國所『敦睦』的『友邦』的一個上校公然宣言把中國政府說得卑鄙齷齪，一塌糊塗，便是什麼地方又被『宣傳』着『王道』，使人更明白中國是一個無所謂主權的掉盡了臉的國家。我們在國內看着這種新聞——也許在本國報上還沒有『眼福』看得到——已是憤懣，在國外看到，覺得『家醜外揚』更要使你氣得七竅生煙！尤難過的是在『國難』一天糟一天，每遇着緊張的『掉臉』的消息，外國朋友偏要向你問這樣，問那樣，使你覺得沒有地洞可鑽！在倫敦時候，有位中國朋友告訴我，他有一夜乘地道車回家，在坐滿着乘客

的車子裏各人都正在展報閱覽在各報上的大標題赫然印着中國的綏遠正受着我們的『友邦』積極派兵宣傳『王道』內容是詳述中國正在恭恭敬敬地『開門揖盜』極力在『親善』上做工夫。有許多人看着報，溜着眼望望這位中國朋友，他一路如坐針氈，簡直不敢正眼看人！這也是『家醜外揚』使人難堪的一個例子。

我旅行到蘇聯南方的時候，有一次參觀一個休養院（他們叫做Rest Home，這在蘇聯名勝區域很多，是專備工作者假期中休養的地方）裏面有一個正在休養的女工問一位同遊的美國準死硬派某甲：『你們美國對工人也有這樣的優待嗎？』他竟欺騙着說：『可是同時有幾位同遊的前進的美國青年却提出抗議，當場說他撒謊！他輕聲用英語打着招呼說道：『你們不要疏忽，使他（指那工人）對美國得着不好的印象啊！』在這準死硬派覺得是不可『外揚』的『家醜』，而那些前進的美國青年却不一樣，這是因為後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用不着掩護，只有努力鏟除的一法。我在海外也只有和這類前進的朋友談論，才不覺得——至少大大地減少——『家醜』的難過觀念，因為他們也很坦白地告訴着他們的『家

醜，『雖則他們的『家醜』和我們的『家醜』在性質上未必相同；但是彼此因爲都了解同是不合理的現制度下的犧牲者，所以富於同情，能很坦白地很客觀地談論着。

在倫敦時有一次和一位很知己的前進的英國朋友同到英國法西斯的首領摩雷開的黨員大會裏去旁聽，到者萬人，摩雷在演辭中主張英國不當拋棄印度，同時主張讓日本有隨意侵略中國的權利，於醜詆印度之外，並醜詆中國。我氣得發呆，這位英國朋友也氣得發呆！爲什麼呢？因爲他是一個思想正確的前進的青年，覺得英國有人主張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在他也是『家醜』。我們聽到一半，還是他先建議『我們走吧！』我們走出了會場，他還繼續大罵英帝國主義的罪惡，再三勸我不要氣。

走狗

「走狗」這個名稱，大家想來都是很耳熟的。說起「走」這件事，並不是狗獨有，豬、雞、會走，自稱「萬物之靈」的人也會走，何以獨有「走狗」特別以「走」聞名於世？飛禽走獸，飛是禽的本能；走是獸的本能；這原是很尋常的事實，並不含有褒貶的意味，但是「走狗」的徽號，却沒有人肯承認——雖則這個人的行爲的確確地是在表示着他是一位道地十足的走狗。換句話說，被人稱爲走狗，大概沒有不認爲是一件大不名譽的事情。你倘若很冒昧地對你的朋友當面說「老兄是個走狗」無疑地是得不到什麼愉快的反應的。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玩狗是西洋女子的一件很普通的消遣的事情——這些女子當然是屬於有閒階級的。中國的「闊」女子中也有很少數的染着這樣的「洋氣」。聽說中國某著名外交官的太太

便極愛養狗，養了十幾隻小哈吧狗。她的丈夫貴爲公使，有時和她出門帶着秘書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等等，要很小心謹慎地替她抱狗，恭恭敬敬的侍候着。但這在中國，究竟寥寥可數，所以我們未曾做過著名外交家的嬌貴太太的隨從者，對於玩着狗的遊戲，究竟不易得到『賞鑑』的機會。依記者『萍踪』所到，在英國看見太太小姐們拖着狗在公園裏或小山，上從容閒步的很多。我在倫敦有一次住宅的附近有一個很廣大的草原（Hampstead Heath）遇着星期日，在這裏遊行的男女老幼非常的多，你在這裏可以看見許多婦女手裏拖着一隻小狗。有許多把拉狗的皮帶解下，讓狗自由地隨着。在這種地方，我才無意中仔細看出走狗的特色。你可常看到這種隨着的小狗，牠的主人可隨便地帶着牠玩，無不如意。牠的主人把一隻皮球往前遠拋，牠就與會淋漓的往前跑，拚命把那個皮球抓着，啣回來給牠的主人；牠的主人再拋，牠再跑，再拚命抓着球，啣回來，有的沒有帶着皮球，只要拾着一根樹枝，也可以這樣拋着玩。這大草原上有池塘，有的狗主人領着狗走進池邊，把一根樹枝拋在池裏遠處，呼喚着狗去啣回來，這狗也與會淋漓地往小池裏鑽，拚命游泳過去，很吃力地把那根樹枝啣回來，

主人顧盼着取樂。至於這主人是怎樣的人，平日幹的什麼事，叫牠幹的是什麼事，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效果，在這疲於奔命的走狗，並沒有什麼分別，只要你豢養牠，牠就對你『唯命是聽』。自號『萬物之靈』的人類裏面的走狗，最大的特色，無疑地也是這個和狗『比美』的美德。其實『衣冠禽獸』的人類中的『走狗』較真的走狗，還要勝一籌的。是真的走狗，除非是瘋狗，至多是供人玩玩，有的在鄉村裏還能擔負守夜的责任，『衣冠禽獸』中的『走狗』却要帶着豢養他（或牠）的主子無惡不作，越『忠實』越『與會淋漓』就越糟糕！在這種地方也可以說是人不如狗，不要再吹着什麼『萬物之靈』了。

侮辱

在法國的時候，聽見一位朋友談起有一個法國學生和中國學生相罵的事情，很使人覺得好笑。這個中國學生是在巴黎某大學讀書，和一個法國同學本來是好朋友，不知有一天怎的彼此吵起嘴來，吵得很厲害，爲着什麼大不了的事，已記不清楚，可是這兩個朋友都鬧得面紅耳赤，現着『悲憤填膺』的氣概。這個中國學生恨極了的剎那間，把法國話都氣得忘記了，脫口而出地罵了一句中國話，很切齒痛恨的罵着說：『操你娘的B！』這個法國朋友平日也喜歡學幾句中國話，但是聽到這句『典型的話語』，睜着眼發怔，莫明其妙，不過覺得他的這個中國朋友的聲音的厲害和臉孔上的那副表情，知道意思不妙，心裏絲毫不疑的斷定這一定是句極端侮辱的話。他把這句話緊緊地牢記着，去問另一個中國學生，問他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被他問着的這個中國學生當然一五一十的解釋給他聽。所可怪的是他聽了之

後和他正在聽着前一個中國朋友說出這句話而莫明其妙的時候，在憤怒的情緒上竟大兩樣，不但生氣，而且很淡然地說：『這却奇怪了！我娘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只要她自己願意，××儘可自由，爲什麼要對我說！』很顯然地，這個法國學生最初認爲莫大的侮辱，後來聽清楚那句話的意義，反而覺得算不了一回事！他完全不了解那句話在我們中國人所感覺到的嚴重性。據說法國人聽見你罵他欺騙，懶惰，反而要火冒得多！這也可見他們個人主義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欺騙，懶惰等等的惡名詞，是侮辱到他個人的身上。A也好，B也好，在他看來，和他個人是不相干的。孟老夫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細想起來，也不盡然。有的人覺得大可『羞惡』的事情，在有些人並不一定有同樣的感覺。

杜重遠先生曾偶然談起以前在東北某鐵路火車上看見一個官兒坐車硬不肯買票，查票的硬要他買，他很氣憤地從衣袋裏拿出有官銜的名片！這位官兒，你也不能說他一定就沒有『羞惡之心』，他知道『氣憤』也許就是『羞惡之心』的表現，但是你莫奈他何的。是他硬認官兒以不買票坐車爲『光榮』，做了官兒坐車還要買票是莫大的侮辱。

推而廣之，就是所謂道德觀念，也要看你所屬的是什麼羣。你所屬的羣裏所謂道德的在別一羣裏不見得也是道德，甚至於是不道德。擺着『道學先生』面孔的人們固然是靠不住，就是自認爲確是有道德的好人，我們也要對他的所謂『道德』仔細分析一下才好。

艱苦奮鬥

凡是做中國的人，眼見中國民族危亡的急迫，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橫行沒有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膺的。照例一個新刊物的創刊詞裏總喜歡說些吉祥的話語，但是我們臨到這樣亡國滅種大難當前的環境，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見的時候越是不免要抱頭痛哭一頓，絕對引不起什麼歡悅的情緒。所以當記者拿着筆準備和諸位朋友談話的時候，我不禁想像着國內外無數的讀者好友都是在極沈痛的心境相對着。

這種極沈痛的心境的存在不是無緣無故的，凡是稍稍像個人的動物，在這樣極端侮辱的境地，誰都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想諸位還記得，不久以前，日本貴族院議員三上參次公然在議會提出極端侮辱中國的提案，說爲維持日本帝室的尊嚴起見，對中國之自稱『中華民國』實爲有礙日本國體的尊嚴，應請外相向中國政府提出勸告，把『中華』改稱『支那』。

以身居國會議員的地位，公然對整個中華民族作毫無忌憚的侮辱，而在『中華民國』却只忍淚吞聲，不聽見政府有一個字的抗議，反而要天天談着『提攜』，哀求『親善』，這類事實便是當前整個中國所處地位的象徵。最近『尊嚴』的『友邦』用武裝保護『走私』破壞中國金融，但是依『尊嚴』的『友邦』看來，過失却反而在被蹂躪的中國，竟由駐華日大使館參贊若杉對中國外長提出警告說，我國報紙登載日鮮人在華北走私猖獗的情況，有背中日親善的原則，要求嚴厲取締。天津國貨售品所有兩個職員被認為有抗日嫌疑，即可在『中華民國』的國境內，由日兵任意拘捕。他們在北平車站，也任意拘捕華人。北寧路橋被炸後，天津和塘沽兩處的華籍職員，就被日軍監視。這些職員的無妄之災，就因為在職員上面有着『華籍』的頭銜。諸如此類舉不勝舉的慘痛的現象，都是擺在我們眼前的鐵一般的事實，不容懷疑。中國在實際上已陷為奴隸的國家，中國人民已陷於奴隸的地位。不願安於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對於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絕對不能再坐視了，必須迅速造成全民族抗敵救國的聯合陣線，用熱血的代價，英勇的行動，向着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猛攻。我們整個民族的生

路，就靠這樣艱苦奮鬥中得來

駐南京的日總領事須磨公開談話發表說，『時局變化至此，中國如不肯與日本携手，那只有對日宣戰，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因為日本倘若退却一步，就等於總退却，日本立志很堅決，只有向前邁進。』這很顯然地公開表示日本非滅亡整個中國，絕對不肯罷休，中國要末投降，自甘亡國，要末只有抗戰。我們深信中國的全國民衆只有毅然決然地發動第二條求生的路，絕對不願走上第一條的趨死的路。

時勢的危迫實在不能讓我們猶豫了！日本陸海外三省已根據須磨的報告，於本月三日召開陸海外三省會議，研究一切侵華大計，在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赴任前，作具體的決定。我們不願坐以待斃，就該下決心起來自救。自救的方法怎樣，這就是本刊所要提出貢獻的問題。

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綫

『思想落伍』是一句罵人的話，這句話的侮辱的嚴重性，雖不及一般人所認為重大侮辱的『男盜女娼』那句話的嚴重，但是使受者滿不高興，似乎是必然的。誠然，思想落伍原不是一件可以欣幸的事情，我們希望自己的思想不要落伍，同時希望個人的思想不要落伍。思想落伍的反面是思想前進。我們在思想上既不願落伍，應該就要前進，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說某某思想的前進，或說某某有前進思想，不過是比較的意思。譬如你的思想比我前進，他的思想比你又前進，這便含有比較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位做文化工作的人，你有着促進我的思想進到你的程度的任務；如果他是一位做文化工作的人，他有着促進你的思想進到他的程度的任務。但是這裏有個很值得注意的要點：促進思想較差的人，引到較前進的程度，負着促進任務者不可唱調過高，必須顧到被促進者的容受可能性，雖則他自己的思想儘管

是怎樣前進。這是努力推廣大眾文化的工作者所最須注意的一點。

這雖是就一般的尋常的觀點看去，但是這個要點應用到救國統一陣綫的上面去也有着很重要的意義，救國統一陣綫的唯一目的是在救國，凡是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我們都該推動他，鼓勵他，引導他來加入救國統一陣綫，盡量貢獻他所有的力量。在這裏面，有的思想也許更前進一些，有的思想也許較後進一些，但是在負有推動，鼓勵，和引導任務的工作者，倘若不顧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徒把自己的前進思想做標準，唱着高調——至少在受者看來是高調——那也許要使原可加入統一陣綫的一個救國鬥士嚇得掩耳遠避，不敢或不願再領教了。這樣一來，所得的結果是恰恰和你所期望的相反，反而阻礙救國統一陣綫的擴大！因為有些人也許對於你的救國宗旨可以贊成——只要他不是甘心做漢奸賣國賊，一定可以贊成的——但是對於你的「前進思想」却未能同意，尤其是離開他的容受性太遠的「前進思想」也許還要引起他的反感；這是負有促進救國統一陣綫任務的工作者所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裝做『思想前進』而故意提出破壞救國統一陣線的過高口號，在旁人看來也許還要欽佩他的思想前進得厲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當，正在中他的奸計。例如我們在目前應集中火力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主義的口號，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他的思想很前進的，而在實際上，却只是破壞集中火力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間接就是分散我們抗敵的集中的力量，嚴格說起來，也就是等於漢奸助敵的行爲了！我們可以糊裏糊塗地上他的大當，中他的奸計嗎？在有意假裝着『思想前進』而放出這樣煙幕彈的人，自是別有用心，但是受他欺騙的人們，也許還以爲是『前進思想』的表現，幫着他宣傳推廣毒素，豈不是冤哉枉也嗎？前進思想原是可寶貴的，但這樣破壞救國陣線的『前進思想』却是要不得的。

救國聯合戰線的誤解

在本期本刊裏，我們承蒙谷雨先生寫了一篇「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對於救國聯合戰線的觀念，讀者已知道大概了。我覺得關於救國聯合戰線，一般人還有着誤解，這種誤解如不消除，聯合戰線的造成，還是不免遭受種種的阻礙，對於抗日救國的前途當然有着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想在這裏提出來和諸位朋友研究研究。

抗日救國聯合戰線，或簡稱爲救國聯合戰線，因爲日本是在用最兇猛殘酷的手段侵略我們所托命的國家，非淪亡整個中國不止，非滅絕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不止，所以我們一想到救國，便和抗日離不了關係，當前一說起救國，就一定要連帶到抗日，更簡省些，或僅稱聯合戰線，它的唯一的目的既是抗日救國，所以一聽到聯合戰線，就明白是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但是望文生義，雖似乎很容易明白，倘不堅決認定聯合戰線的唯一目的只是抗日救國，

在行動上便往往要犯着很大的毛病，不但不能促成聯合戰線，而且反而要破壞聯合戰線，這是很值得嚴重注意的。聯合戰線又有人稱爲統一戰線，有人誤解，以爲甲乙丙等等既加入了統一戰線，彼此間的一切都當然是統一起來了。他不知道甲乙丙等等的加入統一戰線，只是在抗日一點上統一起來，（能抗日即能救國，所以抗日救國還可縮寫爲抗日）在其他方面仍然可以保留着各人的一切，不一定要強同。例如也許你是主張方塊字的，我是主張新文字的，但只要你我都是要抗日的，在這一點上便可以結成統一戰線，我們結成統一戰線，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此外你儘管主張你的方塊字，我儘管主張我的新文字，彼此不必相強。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說主張新文字的人不想說服別人也來提倡新文字，但這是另一問題，不可纏夾在統一戰線裏面。倘若我認爲你既和我結成統一戰線，關於新文字的主張也非統一不可，但是你儘管贊同抗日，却也許不贊成新文字，那末統一戰線反因此破壞了！各黨各派在統一戰線上仍纏夾着黨派的成見，要把一切都統一到自己的方面來，便是犯着這同樣的毛病，這毛病不痛加消除，統一戰線是無法建立成功的。

這意思也並不是說各黨各派加入了聯合戰線，必須拋棄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又是出於誤認統一戰線爲一切統一的意義，可是在共同努力於聯合戰線的時候，必須共同集中火力於對付最大的共同敵人，把自己原有的政治主張擱開。假如甲黨儘管有甲黨的政綱，乙黨儘管有乙黨的政綱，但是倘若不能把最大的敵人驅逐，無論什麼黨，無論怎樣好的政綱，彼此都同歸於盡，所以在統一戰線的階段，各人雖不必拋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必須擱置起來，專對抗日救國這件最急迫的當前大事，作誠意的合作。這才是聯合戰線的真義。我在這裏特提出『誠意的合作』這一點也是特別重要的。聯合戰線的唯一目的既在抗日，加入聯合戰線的各黨各派便應該在這階段內對這一件事作誠意的合作，而不可在聯合戰綫內作本黨本派所特務的活動，含着欺騙的作用，否則也是犯着破壞聯合戰綫的罪惡。所以真能認識聯合戰綫任務的人，一面是要以誠意來參加聯合戰綫，決不會，也不該把聯合戰綫作爲另外目的的手段。

大眾文化的基本條件

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看到他們的『運動大檢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對於那個『運動大檢閱』的『大』字的意義，我是在莫斯科看見的。尋常我們想起什麼運動會，注意力只集中於若干所謂選手，選手的數量無論怎樣大，只是『小衆』一點尋不出『大眾』的象徵。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運動大檢閱』，便有十幾萬的男女青年『運動員』參加。整千整萬的穿着運動衣的列隊挺胸緊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爲之精神振作，想到體育大衆化的偉大。他們有大規模訓練『運動員』的計劃，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後，給以(GTO)銅質徽章(GTO是俄文『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縮寫)這徽章是他們的男女青年覺得最大榮譽之一。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他們的這樣『運動員』有六十萬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萬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

二百萬人！依這樣大衆化的進步速率最近的數量一定是更可驚的了！

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新時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徵！

我認爲這個重要的意義應該運用到大衆文化上面去。我們在這樣艱危的時代，應該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動向，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的方式和內容值得我們作更周詳地研究和討論，但是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衆化，是要不忘却大衆，是要切合於大衆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衆的容受性。我認爲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化人以及熱心中國文化的朋友們都對這個問題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切實的研究。

所謂大衆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廣大的『大』。猶之乎上面所談的『運動大檢閱』不是注重在少數的選手，而是注重在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的廣大數量的『運動員』，爲大衆設想，與其只有少數處於『高大』地位的選手，不如有着滿山滿谷的無限『廣

大」數量的「運動員。」在我們的新文化方面，也有這相類的情形。換句話說，我們要極力使我們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數人，影响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廣大。舉個最近的現成例子：例如整千整萬的大眾所熱烈參加的民衆唱歌團，（原名民衆歌詠團，陶行知先生建議改爲今名，我覺更大衆化些，）便會有這樣的意味。民衆唱歌團便是推廣大衆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工具。我們試想，如有幾萬幾十萬人，同時參加一個悲壯雄偉的民衆唱歌團，這是怎樣偉大的文化工作！

當然，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民衆唱歌團，只是大衆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以爲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羣衆，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羣衆裏面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衆的現實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縮越小，簡直和大衆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爲着少數人幹的呢？還是要爲着大多數人來幹的？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

褊狹態度和動的現實

我在上次曾和諸君談過「從現實做出發點」。我認爲我們如能注意從現實做出發點，便可不致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被苦難所克服的種種流弊。但是還有一點我們也很鄭重地注意的，那就是我們要從動的方面去看現實。我們最要避免的是：現實動了，我們應付現實的態度却是一成不變的，牢牢地保守着老的態度，自以爲是在應付現實，實際已與現實離開了幾千萬里了！如不能把握住動的現實，那還是說不上「從現實做出發點」。

我提出這個要點和諸君討論，意思並不在研究什麼抽象的理論，我的腦際是在縈迴着中國的當前的現實，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中國的抗敵救亡聯合陣線問題，是集中在這個聯合陣線裏的文化工作問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從動的方面去看現實。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和

以前有了很重要的變換。在客觀方面我們的民族敵人是逐步實現他們滅亡整個中國的一貫的計劃。在初期還有一些名流學者希望日××主義肯『適可而止』，提倡『息事甯人』的宗旨，但四五年來的鐵一般的事實教訓，任何人都沒有這樣的夢想了。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是不願亡國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亡國的慘禍所殃及的是全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的漢奸賣國賊之外，（其實漢奸賣國賊也終於要遭敵人的毒手，因為他們只利用漢奸賣國賊做滅亡中國工具，工具的效用完了，便以掃除爲痛快了。）無論你屬於任何黨派，任何階層，任何職業，亡國奴的慘遇是一樣的；到了那個時候，就是一向坐在安樂椅上的名流學者，也只是一個亡國奴，要再伸眉揚氣高談闊論也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觀方面，這個滅亡整個中國的慘禍之迫於眉睫，決不是一黨一派或少數人的力量所能單獨挽救的，必須用整個民族的力量，發動抗敵救亡的大戰爭。現在全國一致熱烈要求的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就是根據這個迫切的需要。所謂抗日救國聯合陣線，就是不論何黨何派，不論什麼階層，不論什麼職業，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聯合起來，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

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在這個搶救中國危亡的現階段，全中國應該只有兩個陣營：一個是抗日救國的陣營；一個是我們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陣營。除這兩個陣營外，換句話說，除我們用全力促成並鞏固第一個陣線來對付第二個陣線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狹的態度，存着黨派或階層的成見，在言論或行動上來引起糾紛，無論有意或無意來破壞這個救國聯合陣線，或減削這個救國聯合陣線的力量，那就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時也就是他所屬的黨派或階層的罪人！因為民族果淪亡了，任何黨派，任何階層，都是同歸於盡的。

做了民族罪人，同時還要做所屬的黨派或階層的罪人，這當然是任何人——除非甘心做漢奸賣國賊如殷汝耕之流的——所不願意的勾當，但是倘若不看清中國當前動的現實，仍不改變褊狹的態度，儘管自以為是照着『正確的』路線幹，不知不覺中却做了漢奸賣國賊的幫兇，這不是很可痛惜的事情嗎？

救國聯合陣線的出發點

救國聯合陣線的呼聲，最近已漸漸地擴大了。只看雪片飛來似的詢問或討論這個問題的來信，便知道這件事已經受到熱心國事者的嚴重的注意，這是和民族解放前途有着極重要關係的一個極可欣慰的現象。

但是因為救國聯合陣線的成敗和民族解放的成敗有着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們必須加以縝密周詳的研究。聯合陣線的口號是一件事，在實際工作上真能認清聯合陣線的真義又是一件事，只在口頭上含糊承認聯合陣線的必要還不夠，必須在行動上真能符合聯合陣線的任務，然後才是真了解聯合陣線。

首先我們要注意聯合陣線的出發點是真聯合。在事實上，中國的各黨各派以及各社會層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是常處於對立的地位，處於鬥爭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中，換句話說，一

向是未聯合的。現在國難嚴重，亡國滅種的慘禍已迫在眉睫，這慘禍所殃及的是整個中國裏面的每一個人，超出任何黨派與任何階層的利害之上，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同時在主觀方面，非用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不能保證民族解放抗戰的最後勝利於是把一向未聯合的一切力量都聯合起來，結成鞏固的救國聯合陣線，同心協力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

我們而努力造成救國聯合陣線，第一步的實際工作是要努力把一向未聯合的聯合起來，一向原已聯合的就用不着再做聯合的工夫。要能合力把一向未聯合的聯合起來，我們首先必須認清聯合陣線的出發點是未聯合。這句話初聽起來，似乎是多說的，但是在促成聯合陣線的實際工作却有着很重要的意義。有些人嘴裏雖喊着聯合陣線的重要，而在行動上却仍在他原來所屬的一黨一派裏面兜圈子，就是沒有黨派關係的，也只是在他的原來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裏面兜圈子，並不注意到要對原來未聯合的人們方面去做工夫，並不注意到推動原來未聯合的人聯合起來。甚至有些人不但不對原來未聯合的人們方面去做工

夫，而且感覺到在他的黨派以外的人討厭，感覺在他原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以外的人都討厭。不但討厭，而且還要拘泥宗派的方式，拘泥不適合於現階段的理論，抹煞一切，輕蔑一切，譏笑人家不前進，拒人於千里之外；甚至中傷攻擊，以爲痛快，結果只是把原來可以加入聯合陣線共同努力於救亡工作的人，驅之門外，使他們袖手旁觀，對國事不聞不問，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們跑到反動方面，妨害救國工作的進行。這樣一來，儘管嘴上喊着聯合陣線的重要，在行動上只是拘守着原來已經聯合的範圍，對於未曾聯合的各方面，不但不能推動他們來加入救國聯合陣線，而且因爲在言語行動上引起他們無謂的反感，對聯合陣線根本引不起他們的信仰與熱誠，當然下願意加入這種『成見陣線』來受閒氣！救國聯合陣線是越廣大越好，因爲越廣大，力量就越雄厚。可是受着關門主義者的摧殘，無論是出於有意或出於無意，結果是原來已聯合的仍然是限於那一些，未聯合的還是同牀異夢，各懷鬼胎！

聯合陣綫與漢奸問題

我在上期筆談裏已經說過，救國聯合陣綫應該把一向未聯合的各黨各派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同心協力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這樣看來，聯合陣綫的門戶是非常廣大的，只要是中國人，都可以來者不拒。不然，在聯合陣綫中間，仍然保持黨派的成見，拒絕和我們意見主張不同的人合作，這樣仍然不免關門主義的錯誤。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救國聯合陣綫，是不是毫無限制地讓一切人們都來參加；假如是漢奸，是否可以讓他參加聯合陣綫呢？

我的答覆是聯合陣綫既然是越廣大越好，我們自然不拒絕任何人參加。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不能讓漢奸參加。但這一點也不必顧慮，因為既然是漢奸，根本就不會來參加救國聯合陣綫。

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我們要認識清楚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漢奸，却不應該把一頂漢奸的帽子隨便去套在別人頭上。

平常所謂漢奸，就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主觀和客觀上都做了漢奸。另一種並沒有漢奸的意識，只是在客觀上有了漢奸的言論或行動。第一種漢奸，如鄭孝胥、殷汝耕、石友三等等，他們是死心塌地做買國賊的，那才是真正的漢奸。第二種漢奸，如有些窮苦的同胞們，因受層層剝削，既無衣無食，又無知無識，他們本意並不想做漢奸，只是爲飢寒所迫，才去充當了敵人的奴才走狗；又如一些認識不正確的名流學者，他們意識上並不想認賊作父，而事實上他們却主張屈服退讓；又如許多軍人，他們並不是不抵抗，只是因爲政府沒有抗敵的表示，他們爲保全實力起見，暫時屈服，這樣在客觀上變成了漢奸。這一類的漢奸，雖然事實上在做漢奸，却並沒有完全昧絕良心，安心做亡國奴。所以這些人只能算作準漢奸，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漢奸。

救國聯合陣線的門戶既然越寬大越好，所以只能拒絕真正漢奸的參加，至對於那些準漢奸，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參加，而且應該用極忠實誠懇的態度，加以勸導說服，使他們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這樣才是救國聯合陣線的正确態度。

救國聯合陣線既然要把準漢奸都轉變過來，使他們共同參加抗敵救亡的工作，那麼其餘沒有漢奸行動的一切人們，自然更不應該隨便排擠了。一般對於聯合陣線問題，往往容易犯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把一切不參加聯合陣線的人，都一律當作漢奸看待。其實有許多人一時不參加聯合陣線，只是因為對於聯合陣線，不夠瞭解的緣故。竭力設法，教育大眾，使大家都瞭解聯合陣線的意義，使大家都參加聯合陣線，這正是聯合陣線本身的任務。要是偶然因為別人不參加聯合陣線，而隨意套上去一頂漢奸的帽子，這依然是關門主義的方式，而不是聯合陣線的方式。

但是有的人懷疑聯合陣線的門戶放得太寬，難免真正的漢奸混進了城門，在內部起破壞作用，這又怎麼辦呢？我却以為這一層可以不必顧慮。因為救國聯合陣線假如採取光明正大的態度，即使有奸細混進其間，馬上會顯出原形，馬上會被羣衆踢出。問題是在於我們對於救國聯合陣線有沒有自信力。關於這一點，當在下期裏再詳細申說。

今年的八一

十二年前的八月一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爲了那一次大戰，在前線陣亡了一千萬兵士，受傷和殘廢的更不止這個數目。人類文化進步因此要退後五十年。這一次大戰結束雖然已有十八年。但是××主義一日不消滅，戰禍也一日不會終止。事實上，××主義者老早就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到了最近幾年，戰爭的威脅，越來越迫近。於是全世界要求和平的人民，特定八月一日爲反戰節日。到了這一天，各國大都市都有反戰的示威大會，全世界的人民大衆，在這一天，一致團結起來，反對戰爭，反對戰爭的製造者——法西斯黨。因此八一成爲全世界人民大衆團結的紀念日，也就像五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的紀念日。

現在今年的八一節又到來了。今年的八一比之於往年，更有重要的意義，因爲它有着下面的幾個特點：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在目前是比以前幾年更來得迫切了。在西方，意大利正在以武力兼併阿比西尼亞，國聯的經濟制裁，竟遭失敗。德意奧三個法西斯國家的新團結，就是大戰快要到來的警報。但澤問題和東歐問題，最近又日趨嚴重。西班牙人民政府與法西斯叛軍的內戰，也有擴大為國際法西斯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可能。至於東方，五年以來侵略戰爭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現在華北和閩邊又告吃緊，日蘇邊境衝突事件，日有所聞。在這樣嚴重的局勢下面，大戰在短時期內，不免爆發，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和平的力量，也比往年增加了。不必說，反××主義的蘇聯，因內部建設的成功，聲勢一天天浩大，而法國西班牙人民陣線政權的樹立，各國人民反戰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一天天鞏固和擴大，也都證明人民大眾的反戰的力量確實比以前堅強得多了。

第三，因為一面法西斯黨正在準備侵略戰爭，另一方面人民大眾的和平勢力也普遍伸張，所以全世界已逐漸劃分為侵略和平這兩大營壘。和平的營壘只有聯合一切反對侵略的國家，武裝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才能撲滅侵略者的陣營，而建立真正持久的世界和平因

此今年八一的主要口號不僅是簡單地反對戰爭，而應該是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我們中國幾年以來，都是因不抵抗而喪失國土。現在民族危機千鈞一髮，抗敵救亡已成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所以在今年八一，我們尤其應該認識清楚，只有團結國內人民的力量，聯合國外反侵略的勢力，立即武裝全國民衆，一齊向當前主要的民族敵人進攻，這樣才是中國民族死裏求生的唯一出路。

反對侵略的神聖戰爭的軍號在響了。大家在和平陣營上面集合起來罷。

聯合陣綫和黨派立場

關於救亡聯合陣綫問題一般最容明引起疑問的，就是聯合陣綫中間，是否容許黨派立場的存在？加入了聯合陣綫以後，是否要拋棄各黨各派的原有立場？於是有的對於聯合陣綫逡巡躊躇，不敢輕易加入，有的把聯合戰綫立場和黨派立場對立起來，不能找到這矛盾的統一。

是的，聯合陣綫的目的，是聯合目前中國各黨各派各階層，以共同救亡禦侮，所以聯合陣綫中間可以包含各種不同的階層，和代表各階層的各黨各派。但是各黨各派加入聯合陣綫之後，並不是把原來的黨派立場消滅了。而且也不是把各黨派的相互對立關係消滅了。相反地，一個黨既然採取了聯合陣綫的政策，那麼聯合陣綫的立場就成爲黨的立場，聯合陣綫的實現，就是黨的政策實現。所以加入了聯合陣綫，不僅不會消滅黨派立場，而且使一黨一派

的原有政策，在聯合陣線中間，更容易求得實現和發展。在聯合陣線中間，一個黨派對於其他對立的黨派，也依然可以作理論的鬥爭。而且正惟因為同在聯合陣線之內，這理論的鬥爭，更容易展開。所不同的，就不過是鬥爭的方式而已。在平常，黨派的鬭爭，可以不擇手段，可以採取一切無情的方式，以達到消滅對方的目的。現在聯合陣線中間，爲了增強抗敵救亡的力量起見，不妨暫時容許敵黨的存在，同時却用理論鬥爭的方式，以爭取敵黨所影響下的羣衆，這種鬭爭的方式，表面上看去，要和平的多，可是事實上更容易使一個理論真正堅強的黨派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這種的鬥爭方式，決不是屈服，決不是妥協。

黨派的產生是以階層爲基礎的，而聯合陣線則以全民族爲基礎。黨派鬭爭是爲了階層的利益，而聯合陣線則是爲了全民的利益。這兩種組織在表面上似乎不能相容。實際上却不然。在目前的中國，整個民族陷於淪亡，全民的利益和階層的利益，已經不能分離。只有民族革命得到勝利的時候，階層利益才有保障；也只有社會解放實現的時候，民族解放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全民的救亡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在民族危機十分深重的

今日却只有從民族解放鬥爭中間開展社會解放的鬥爭，而不是在社會解放鬥爭的口號下，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聯合陣線的主要作用，就在這裏。所以把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分作兩件事，固然是錯誤；如果認爲目前只是作民族解放的鬥爭，而把社會解放的鬥爭，暫時擱置，更是大錯而特錯。

因此，一個黨派既然採取了聯合陣線的政策，便是認定在目前要從全民的對外抗戰中，去爭取所代表的階層的利益。因此一切目標，都要集中在全民對外抗戰的實現，這樣才是參加聯合陣線的黨派的立場。我們主張槍口一致對外，並不是說在我們內部，沒有民賊，沒有漢奸。事實上漢奸與民賊，是和外敵勾結起來，倚靠外敵以存在的。所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以全民的力量，來消滅外敵，外敵消滅以後，漢奸與民賊，自無容身之地。到了那時，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便同時達到了目的。

當然，這不是說在救亡聯合陣線中，我們對於漢奸民賊，可以不必有什麼戒備。相反地，我們應該儘可能向羣衆指出漢奸理論與漢奸行動，肅清聯合陣線內部的一切奸細作用，假如

我們在聯合陣線內部不能作正確的理論鬭爭聯合陣線政策只能算是失敗。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却時時刻刻，應該從抗敵救亡的實際行動中，去啓發領導羣衆，這樣才能使聯合陣線的立場與黨派立場真正統一起來。

相信我們自己

本刊在香港出版，先後共出十一期。在這十一期中間所登載的主要論文，有一大部分是討論救亡聯合陣線的問題。爲了這個問題，筆者又曾經和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三位先生聯名發表了一篇文章，印成小冊子分送。本刊並曾於前期登載啓事，徵求南中國文化界對於那篇文章的批評和指教。本刊遷滬以後更打算搜集其他各方面的意見，另印救亡聯合陣線問題特輯。因此本刊在香港出版的短時期內對於『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衆文化』這個任務，即使沒有做出十分成績，但是對於目前最緊要的救亡聯合陣線問題却總算有些微的貢獻了。

不過聯合陣線問題並不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雖然本刊對於本問題的論辯，已經耗費許多墨汁，但是筆者依然覺得意有未盡。例如本刊第八號筆談裏，我曾經說過，要避免漢奸

的破壞我們必須對於聯合陣線有自信力。但是自信力爲什麼十分必要，以前還沒有說過。現在無妨再在這裏補充說明一下。

在目前全國人民應該團結禦侮，對於這一點大家再不會引起問題。現在所引起的問題只有兩個，其一是在聯合陣線裏邊懼怕漢奸的破壞，其二是認爲不先肅清漢奸，就不能抗×。這種疑懼和誤解，要是不加以解消，聯合陣線就無法建立起來，因爲懼怕漢奸破壞，會減少抗×的勇氣，主張先除奸後抗日，就等於主張先安內後攘外，都是和聯合陣線的原則不相容的。其實這種疑懼和誤解，都由於缺乏自信力的緣故。假如我們相信抗×救國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我們相信聯合陣線，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那末縱使有漢奸國賊混入聯合陣線內部，我們以至誠相待，亦必然能使少數漢奸，翻然覺悟。如仍不能覺悟，也必不免爲大多數愛國分子所唾棄。在那時，漢奸要在聯合陣線中起破壞作用，一定不容易發生效力。相反地，同在聯合陣線中，要是互相猜忌，互相懷疑，結果是大都把一切力量用在對內的戒備和攻擊上面，這樣還能夠說得上團結救亡嗎？

主張非先肅清漢奸不能抗敵，也是由於過分懼怕漢奸而看輕自己這一種心理所致。假定我們相信抗×必然得到最後勝利，那麼抗×勝利以後，挾寇自重的漢奸，不除而自除。但是有的人對於聯合戰線的最後勝利，沒有確信，覺得質質然和人家聯合，結果會被別人利用，因此堅主非肅清漢奸不能抗日。結果，漢奸仍不容易肅清，而救亡工作，却反因此延擱下來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相信自己：相信我們自己是光明坦白，為神聖的救亡事業而工作，因此更不必有什麼顧忌猜疑，相信我們自己在救亡運動中，必然得到最後偉大的勝利，這樣我們就無妨把心眼放寬些，對於各種不同的黨派，不同的階層，都取寬容的態度，惟有這樣，聯合陣線才能夠建立而且鞏固擴大起來。

分頭努力

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有人提出鎗桿和筆桿對救國誰的力量強的問題。有些人對

題打了一頓筆墨官司，結果還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沒有得到什麼一定的結論。其實鎗桿自有鎗桿的效用，筆桿也自有筆桿的效用，只須用得其當，都可有它的最大的貢獻；真要救國，應該各就各的效用，作最大限度的努力。當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敵禦侮的時候，我們親眼看到鎗桿對於保衛國土所貢獻的偉大的力量。但是同時我們也親眼看到民衆被愛國言論和宣傳所引起的異常深刻的感動，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婦孺老幼，都奮發努力於後方的種種工作，軍力和民力打成了一片。

救國的工作是要靠各種各樣的分工配合而成的，是要各就自己所有的能力做最大限度的奮鬥。

試再就軍事上的作戰說吧，有的擔任前線的衝鋒，有的衛護後方的輜重，各有各的任務，誰也少不了誰；你如果一定要使衝鋒的隊伍都到後方來衛護輜重，或一定要使輜重隊都往前方去衝鋒陷陣，那在軍事上作戰上都是損失。

不但鎗桿和筆桿，不但軍事上的作戰，我們對於各種各樣的工作，乃至似乎是很平凡的工作，都應作如是觀。例如一個報館裏捲包報紙的社工，在表面上省來，他的工作似乎是很平凡的，但是只要這個報是熱心參加救國運動的，在救國的任務上，他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意義。

稍稍有一點知識和良心的中國人，沒有不時常想到中華民族解放沒有，不殷切盼望中華民族解放的早日實現，所以也沒有不想在這上面盡他的力量。這種心理的隨處流露，在救國運動方面當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却有許多人因此感到苦悶，總想跳出他所處的現實，跑到一個合於他的理想的環境中去努力。他沒有想到我們應該各就各的能力，即在現實中隨時隨地做工夫，更沒有想到環境若使真能合於我們的理想，那需要我們的努力也就不

會怎樣迫切的了！

也許我們自己還沒有做到『最大限度』，那只有更奮勉地加工幹去。也許別人還沒有做到『最大限度』，那我們也不應該輕視他，却要指示他，鼓勵他，幫助他做到『最大限度』。讓我們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標下，分頭努力幹去！

在香港的經歷

七八年來，我的腦際總縈迴着一個願望，要創辦一種合於大眾需要的日報。在距今四年前，由於多數讀者的鼓勵和若干熱心新聞事業的朋友的贊助，已公開招股籌辦，於幾個月的短時期內招到了十五萬圓的股本，正在準備出版，不幸以迫於環境中途作罷，股款連同利息，完全歸還。這事的經過，是讀者諸友所知道的。但是要創辦一種合於大眾需要的日報，這個願望仍繼續不斷地佔據了我的心坎，一遇着似乎有實現這件事的可能性的機會，即又引起我的這個潛伏着的願望的波動。

有一位老友在香港住過幾個月，去年年底到上海，順便來訪問我，無意中談起香港報界的情形，據說在那個地方辦報，只須不直接觸犯英國人的利益，講抗敵救國是很有自由的，而

且因爲該地是個自由港，紙張免稅，在那裏辦報可從紙張上賺些餘利來幫助維持費，比他處日報全靠廣告費的收入，有着它的特別的優點。這位老友不過因談到香港的狀況而順便提及香港報界的一些情形，他雖言之無意，我却聽之有心，潛伏在我心坎裏多時的那個願望又起了一次波動。

今年的三月間，我便帶着這樣暗示的憧憬到香港去看看。我先找些當地新聞界的朋友談談，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是因爲在文字上已久成了神交，所以很承蒙他們熱誠指教，認爲可以辦。

於是我們便想到經費。我堅決地認爲大眾的日報不應該是一兩個大老板出錢辦的，所以我也無意懇求一兩個大老板的援助；又堅決地認爲大眾的日報應該要完完全全立於大眾的立場，也不該由任何一黨一派出錢辦的，所以我也無意容納任何黨派的援助，結果當然想到公開招股的辦法。但是公開招股無論怎樣迅速，不是在很短的時期內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因爲要顧到入股大眾的利益，和創辦者的信用起見，我們決定在公司創立會未開幕以前，已

收到的股款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這個難題使我躊躇了好些時候，同時又因為香港印刷業的落後，實出人意料之外，要印日報，非自備印刷機不可，因為找不到什麼印刷所來承印。辦報自備印刷機，是一項很大的開支，這可是又一個難題！

但是事有湊巧，不久有一個印刷公司因為要承印一家日報，從德國買到了一個一九三五年式的最新印刷機，一小時能印日報一萬九千份。那家報的每日印數只有一萬份。所以這部印刷機很有充分的時間餘下來再承印另一家報。這個意外的機會使我興奮起來，因為印刷機無須自備，這至少在短時期內使我們在經濟上輕鬆了許多，至於此外的開辦費和暫時的維持費，那是有設法的可能的。

這樣，我才開始籌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已收到的股款，在公司創立會未開幕以前，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我當然要嚴守這個原則。但是要先把生活日報試辦起來，是不能不用錢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文化事業的好友商量，由我們幾個人輾轉湊借了一筆款子，經過一個多月的特別快車的籌備苦工，到六月七日那一天，七八年來夢寐縈懷的生活日報居然

呱呱墮地了。其實在香港的讀者和它第一次見面雖在六月七日的早晨而這個孩子的產生却在六日的深夜。那天夜裏我一夜沒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裏的工廠上去看着。我親眼看着鑄版完畢，看着鑄版裝上捲筒機，看着發動機撥動，機聲隆隆——怎樣震動我的心的機聲啊！第一份的生活日報剛在印機房的接報機上溜下來的時候，我趕緊跑過去收受下來，獨自含着微笑，那時的心境，說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這枝禿筆所能追述的！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對於這個『處女報』的格式和內容已覺得滿意——不，其實還有着許多的不滿意——但是我和我的苦幹着的朋友們的心血竟有了具體化，竟在艱苦困難中成爲事實，這我在當時實不禁暗中喜出了眼淚的！我知道這未免有些孩子氣，有些『生惕門陀爾』，但是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我也就毫不隱飾地老實報告出來。

我們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獃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爲數當然很有限，所以報館是設在貧民窟裏，經過了不少的困難和苦鬪，如今追想前塵影事，雖覺不免辛酸，但事後說來，也頗有趣，下次再談吧。

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為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獃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爲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但是說來好笑，我正在香港貧民窟裏籌辦報館的時候，香港有一家報紙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聞，說我被廣西的當局請到南甯去，擔任廣西省政府的高等顧問，同時兼任南甯民國日報總主筆和廣西大學教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云云。你看這多麼闊！不但『顧問』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總主筆』而且還兼着『大學教授』！一身兼這樣的要職三個，依我們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來，每月收入僅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還未免過於菲薄。但是在我這樣的一個窮小子看來，確覺得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且老實說，確也有些垂涎欲滴！因爲自從我結束苦學生的生活，在社會裏混了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賺過這樣大的薪水；自從在十年前因生活週刊業務發達，我不得不擺脫其他一切兼職——要附帶聲明的是這裏沒有什麼『高』沒有什麼『總』也沒有什麼『大』只是有着夜校教員之類的苦工——用全副精神來辦這個刊物，計算起來，每月收入總數還少去十

塊大洋十年來一直是這樣。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負擔，人口日增，死活無常，只靠着一些版稅的收入貼補貼補，因為出國視察借了一筆款子，有好幾本著作的版稅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稅抵消了一部分，還欠着朋友們幾千塊錢，一時無法償還；不久以前一個弟弟死了，辦喪事要舉債；最近一個庶母死了，辦喪事又要舉債——好了不嚙嚙了，在這樣嚴重的國難裏面幾乎人人都有『家難』的時代，我知道諸君裏面有着同樣痛苦或更厲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該多說關於個人的訴苦的話，我只是說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白元以上』並不是用不着，但是我們爲保全在社會上的事業的信用，我們絕對不能無條件拿錢，而且我們知道僅僅孜孜於在各個人的圈子裏謀解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話越說越遠，我不得不請諸君原諒，現在再回轉頭來談談在香港貧民窟裏辦報的事情吧。我在香港只是在貧民窟裏辦報，從未到過廣西，所以誰做了廣西政府的『高等顧問』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在香港的貧民窟裏所辦的那個報館。

香港的市面和大多數的居民是在山麓，這是諸君所知道的。在這裏你要看看豪華區域

和貧苦區域的對比，比在任何處來得便當，因為你只要跑到山上的高處俯瞰一下，便看得見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謂西營盤和它附近地方，都是些狹隘齷齪的街巷和破爛不堪的房屋，像蟻窟似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這樣整批的貧民窟之外，在熱鬧的市面，於廣闊的熱鬧的街道中間，也夾有貧民窟，這可說是零星的貧民窟。我們的報館一面要遷就熱鬧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貴的房租，所以便選定了一個零星貧民窟裏的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許已為諸君所耳熟的利源東街二十號。

這一條短短的小街雖在貧民窟裏，雖然汽車貨車不許進去，地勢却很好，夾在最熱鬧的德輔道和皇后大道的中間，和印刷所也很近。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似乎和『高等顧問』有同樣闊綽的姿態，但是每層只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面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面臨街有一個窄得只夠立一個人的露台，至於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為怪。天花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看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面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面下來，你只得緊緊地把身

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這好像在蘇州狹隘的街上兩輛黃包車相碰着，有着那樣擁擠不堪的滑稽相。屋子當然是髒得不堪，但是因為包括鋪面的關係，每月却要租一百塊錢。我承蒙一位能說廣東話的熱心朋友陪着到經租帳房那裏去，往返商量了好幾趟，在大熱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幾次大汗。總算很幸運地把每月屋租減到九十塊錢。

這樣髒得不堪的屋子，當然需要一番澈底的粉刷，否則我實在不好意思請同事們踏進去；並不是嫌不好看，要努力辦事不得不顧到相當的健康環境。可是那裏的粉牆經過粉刷了五次，才有白的顏色顯露出來。漆匠大叫倒霉，因為他接受這樁生意的時候，並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才看得見白色。我不好意思難為他，答應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後，加他一些小費，那個窄小的樓梯，是跑上二樓和三樓必經之路，樓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來平面的竟變成了凹面的了，有的還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於是不得不修的修，換的換，這也是和房東辦了許多交涉而勉強得到的。

談起來似乎瑣屑，在當時却也很費經營，那是小便的地方。在那些貧民窟的屋子裏，一般

人的習慣，廚房裏倒水的小溝，（樓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面去）同時便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廚房和樓下的屋後小弄，便是臭氣薰蒸的區域。報館裏辦事的人比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無法使它減少，如沿用一般人的辦法，大家恐怕要薰得頭痛，無法辦公了。說的話已多，這事怎樣解決，只得且聽下回分解。

三

在貧民窟裏辦報館，佈置起來確是一件怪麻煩的事情！我曾經說過，我們的報館所在地的利源東街，是夾在兩條最熱鬧的街道的中間。在那兩條最熱鬧的街道上，各店鋪裏的衛生設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在地下裝有現成的溝筒，他們都可以裝設抽水馬桶，和有自來水衝的白瓷小便斗。但是利源東街雖這兩條大街雖不過幾步遠，情形便大不同了。因為那條街上的住戶根本沒有力量享受衛生的設備，所以地下根本就沒有什麼衛生設備適用的溝筒。你獨家要裝設也可以，不過先要就馬路的下面裝設溝筒，從大街的地下溝筒接到屋裏的地下來才行。這項工程至少要花掉一千多塊港幣，合華幣是近兩千塊大洋，這當然不是我們這樣

的窮報館所出得起的，只得想都不去想它。那幾天我常常到報館裏去視察修理工程的進行，屢次有『苦力』模樣的不速之客來盤問，他講的是廣東話，我一竅不通，但是他却鏗而不捨，找個懂廣東話的朋友來翻譯一番，方知道他所爲的是馬桶問題。原來在這貧民窟裏倒馬桶的生意，也有好幾個人要像競爭國選那樣地熱烈，爭取着『倒權！』他們的這種重要任務，却也很辛苦，每夜一兩點鐘的時候，就要出來到各戶去執行『倒權』的；在取得『倒權』以前，還要費過一番激烈的競爭。在我們呢？馬桶問題倒不及他們那樣着急，因爲我們把第二層の後間那個小廚房粉刷一番，叫木匠師傅用木板來隔成兩個小間，買兩個白瓷馬桶，加些臭藥水，還勉強過得去。所要設法解決的是小便所問題。我原想買個白瓷小便斗，裝在自來水龍頭下面，斗底下裝一個管子，通到下層地下深處的泥裏去，這樣可以不必以後弄爲尾間，稍稍顧到公衆的衛生。主意打定之後，便和一位能講廣東話的朋友同跑到一家專買白瓷抽水馬桶和白瓷小便斗的公司裏去接洽。那公司裏的執事先生們聽說是個報館裏要裝白瓷小便斗，以爲是一件很闊的生意經，很殷勤地特派一位『裝設工程師』到我們的報館裏來設計，我們

覺得却之不恭，只好讓他勞駕。那位「裝設工程師」一踏進我們的小廚房便搖頭他說在這裏要裝設白瓷小便斗，先要打樣繪圖呈請香港政府核准，領取執照，否則便是違法的行爲，幹不得！我問他在那條街上一般住戶都是在廚房的水溝裏隨意小便，使廚房和後弄都臭氣薰蒸，是否也要呈請香港政府核准呢？他知道這是開玩笑的話，彼此付之一笑。但是小便所問題還是未得解決。最後只得僱泥水匠用白瓷磚就水溝的洞口砌成一個方形的大斗，下面挖個洞，每日由茶房負責倒水衝幾次，由那裏還要流到後弄去，那也就無可如何的了。這在該處的泥水匠是一個新式的「工程」，做得不對，以致做了又拆，拆了又做，經過幾次的麻煩，才算勉強完事。

屋子的後部分的問題解決了，但是屋子的前面，是朝西，陽光逼着要使你中暑，於是決定裝設一個布蓬。裝設兩個風扇，並在那狹隘的露臺的鐵欄杆上排幾盆花草。門面和內部都油漆一新。這樣慘澹經營之後，這一所房屋，在那條貧民窟的街道上簡直是一所最整潔的屋子了，我把它比作一個十足的鄉下土老兒硬穿上一套時裝。

有許多同事是陸續由上海來的，我每次很高興地到碼頭去接他們，他們到了第一件事是要先到報館去看看。我雖知道這時我已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這個貧民窟的屋子刷新了一下，但是心裏還是忐忑，不知道同事們看了覺得怎樣，雖則我引導他們踏進報館的時候，總是一團高興，因為這是經過一番苦工夫所得的結果。後來他們裏面有的承認初看的時候覺得不慣，後來也就漸漸地看慣，覺得很自然了。

我的辦公室是在二層樓的前一部分，隔開一個小小的房間，排着三張的辦公桌，已是擠得難於迴旋。窗關着很悶；窗開着吧，斜對面的那家小鐵店的煤煙常常溜進來替你的桌上和面孔上加些材料。那裏的房屋都是兩層樓的樓房，中間隔開的街道既然很窄，所以兩邊樓房相望是很近的。有一夜斜對面的樓上死了一個人，全家十幾口，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擠在那個房間裏圍着躺在床上的死屍哭着，哭得很悲哀，聽了令人爲之慘然；我正坐在自己的小房間裏寫社論，因為距離很近的緣故，那個硬挺挺僵臥着的死屍，恍惚就睡在我的身旁附近，尤其是那樣悲哀的泣聲，使我雖拿着筆在構思，心目中所湧現的總是一個死屍，一羣窮苦的婦

人孩子的慘况，心裏想也許那一羣可憐的婦人孩子們就全靠那個死人活命，現在是陷入了非常淒慘的境域了！心裏這樣地被擾亂着，好久好久寫不出一個字來！

被我由法國電請回來幫忙的胡愈之先生，他的辦公處就在我的對面，有一夜他發現個大蜈蚣！他生怕再有蜈蚣出來，在不知不覺中，乘他在寫作無暇他顧的時候，取道他的褲腳管向上前進，那還得了！他搖頭慨歎這種地方真有些危險！我想他當時的兩個褲腳管裏大概是常在宣佈戒嚴的狀態中。

四

在香港辦報，登記也是一個難關——這登記當然是指向香港政府要求的。我在事前就聽見說，『外江老』——不是廣東人——尤其是名字被多數人知道的文人，要出面登記，是很不容易通過的，因為他們怕有什麼政治作用。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因為有政治作用的廣東老也儘有可能，並不限於什麼『外江老』；名字不見經傳的文人也不見得都是馴服的羔羊。但是他們不講這些，他們只怕由外面來的人存着搗亂的意思，使他們的統治發生危險，

這種心理猶之乎我由歐洲到美國上岸的時候美國的移民局人員『像煞有介事』地問我有沒有意思要推翻美國政府！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來辦報，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賺錢。我既不是廣東老，又不是商人，尤不幸的是名字又不能避免被人知道，所以出面登記是十八九難於通過的。但是不幸中的幸事是有一位足夠資格的朋友同心贊助，由他出面去登記。登記的手續照例是要親到香港政府裏什麼『華民政務司』洋大人在那裏給他問話。最要緊的話是問你爲什麼要辦報？這位『識相』的朋友咬定宗旨說是要賺錢，要賺錢是他們認爲最可欽佩的大志，至高無上的美德，這個難關便這樣地被通過了。

當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事是終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記完畢以後，是誰在那裏主辦，終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過英國人素以『法治』自許，在法定的手續完畢之後，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什麼罪名，他們是不好意思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的。最糟的是在登記的時候，他們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乾脆地不准許；在已經准許之後，却不至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這種『法治』的實質究有幾何，姑且不論，但說來好笑，據說住在香港的一般廣東

老，遇着與人吵嘴的時候，他曾這樣地警告對手的人：『你不要這樣亂來，這是個法治的地方！』無論如何，後來香港政府的警務處終於知道那個報是我在那裏主辦的，這不足怪，因為他們有偵探，這種情報當然是可以得到的。

這雖不致就取消我們的登記，但是既受他們的嚴重的注意，也就不免增加許多麻煩。他們要進一步抓到我們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銀行的經理，因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會民衆歌詠會的事情，去見警務司，剛巧我們的報上發表一篇鼓勵這歌詠會的社論，那位警務司便再三向他詰問我為什麼要在香港辦報，並老實說他們無時不在嚴重地注意我。同時有朋友來告訴，我說警務處曾有公文到新開檢查處（香港政府設的），叫檢查處每天要把檢查生活日報時所抽去的言論和新聞彙送到警務處察閱。他們的意思以為已經檢查過的東西不會有什麼毛病，被檢查抽去的東西一定可以露出馬脚來，一旦被他們捉着可以藉口的證據，便可以開刀了！這可見我們當時所處的環境的緊張。但是事實究竟勝雄辯，他們的偵探，他們的檢查員費了許多工夫之後，所得到最後結論却很妙，他們說：『這只是幾個讀書人辦的報，沒有

什麼政治的背景」倘若他們所謂「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麼黨派的關係，那我們當然是絲毫沒有，他們的話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却未嘗沒有我們的背景！我們的背景是什麼？是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衆文化！我們是完全立在民衆的立場辦報，絕對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是我們辦報却也有我們的宗旨。我們的宗旨是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

但是我們總算是僥倖得很，在他們的那個「最後結論」之下，我們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我們不但得到警務處的諒解而且也得到新聞檢查處的諒解。

但是這個意思却不是說新聞檢查處就一定沒有麻煩。關於香港新聞檢查處，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別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談。

五

談起香港的新聞檢查，却有它的饒有趣味、別緻的情形，雖則在我們主張言論自由的人們，對於新聞檢查總覺得是一件無法歡迎的東西。

香港原來沒有什麼新聞檢查處，自從受過海員大罷工的重大打擊之後，驚於輿論作用

的偉大，害怕得很，才實行新聞檢查，雖明知和英國人所自詡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顧不得許多了。據我們的經驗，香港新聞檢查處有幾種最通不過的文字，其一是關於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於提倡勞工運動的文字。香港的新聞檢查原在吃了工潮苦頭之後才有的，他們最怕的當然是直接間接和勞工有關係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說什麼「一家肚子餓通，沒有棉衣過冬，破屋呼呼西北風，媽媽病得要死，不能送終！」這些話是他們所最怕聽的！至於那首詩的末段：「罵他他不痛，怨天也無用，也不可做夢。拳頭聯起來，碰！碰！碰！」那更是他們聽了要掩耳逃避的話語！所以這首詩在香港完全被新聞檢查處抽去，後來我把它帶到上海來，才得和諸君見面。（見本刊第十二號）

他們不許你用「帝國主義」，所以各報上遇着這個名詞，總寫作「××主義」，讀者看慣了，也就心領意會，知道這「××」是什麼。我們知道在上海各種日報上還可以把這四個字連在一起的，這樣看來，香港新聞檢查似乎更嚴厲些；但是也不盡然，例如在上海有許多地方鑒於「敦睦邦交」的重要，只寫「抗×救國」在那裏，這「抗」字下的那個字是可以隨處

明目張膽寫出來的。中國人在那裏發表抗敵救國的言論，倒比上海自由得多。這一點在我們做中國人的說來，汗顏無地，但却是事實。生活日報開張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領事館就派人到我們的報館裏定報一份，好像公然來放個炸彈，但是我們後來對於抗敵救國的主張還是很大膽地發表出來。

他們不但檢查新聞，言論同樣地要受檢查。有些報紙上的社論被他們完全抽去，因為夜裏遲了，主筆先生走了，沒有第二篇趕去檢查，第二天早晨社論的地位便一大片雪白，完全開着天窗，這是他處所未見的。有一天看見某報的社論的內容根據四個原則，裏面列舉這四原則，但是在（一）下面，全是接連着的幾行××！在（二）（三）（四）各項下面也都同樣地全是接連着的幾行××！這篇東西雖然登了出來，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生活日報的社論還算未有過這樣的奇觀。我每晚寫好社論之後，總是要等到檢查稿送回之後才離開報館。有一夜因檢查擱置太遲，我想內容沒有什麼『毛病』，先行回家，不料踏進門口，就得到報館電話說社論被刪去了一半！我趕緊猛轉身奔出門，叫部汽車趕回報館，飛快地寫過半篇

送去再試一下，幸得通過第二天才得免開一大塊天窗，其實我所要說的意思還是被我說了出來，不過寫的技術更巧妙些罷了。無論他們刪除得怎樣沒有道理，你都無法和他們爭辯，都無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衆歌詠會前途無量，結語是「我們希望民衆歌詠會普遍到全中國，我們願聽到十萬百萬的同胞集體的『反抗的呼聲！』」這末了五個字是引着我香港青年會發起這歌詠會的小冊子中語，但是他們硬把『反抗的呼聲』這幾個字刪去成爲『×××××』，我看了非常的氣，尤其是因爲檢查處的人也都是中國人，但氣有什麼用？有時因爲檢查員沒有看懂，有的話語也可以溜過去。據說某報有一次用了『布爾喬亞』這個名詞，檢查員看不懂，立刻打電話給那個報館的主筆，查問這究竟是個什麼傢伙，答語說是『有錢的人！』有錢的人應該是大家敬重的，於是便被通過了！

廣告雖不受檢查，但報館要依檢查處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載白濁廣告，『濁』字要用□的符號來代替，生殖器和性交等等字樣都須有一部分用□的符號來代替。據說他們的理由是：凡不可和自己的姊妹說的，就不可登出來。這理由可說是很別緻的，說來失敬，帝國主

義和白濁竟被等量齊觀因爲在各報的廣告上（大都是屬於書籍的廣告）也只用□來代替帝國兩個字。這也許是帝國主義發抖時代的象徵吧！

六

我在上次和諸位談過香港新聞檢查的情形。我們主張言論自由的人們，根本反對新聞檢查的制度，所以對於香港的新聞檢查當然也說不上有什麼好感。但是平心而論，中國人在香港辦報，尤其是在當前的階段，所受到的檢查制度的桎梏，比在中國各處却是比較地好些。這並不是說香港的檢查比他處寬大些，却是因爲他們所忌的特點不同，而這些特點在我們却沒有很大的妨礙。例如他們對於攻擊英國的言論是最忌的，有妨礙英帝國尊嚴的新聞是最忌的；這在我們正要全國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最大敵人的階段，我們對於其他各國原不願多所樹敵，不但不願多所樹敵，而且要盡量增加他們和中國的好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英國，只須他們不幫助我們民族最大敵人的行爲，原來就無意和他們爲難的。又例如他們最怕煽動階級鬥爭，所以凡是關於這類的文字和消息，也是他們所最忌的；這在我們正在

極力提倡全國不分階層團結禦侮的時候，我們的救國主張是從整個民族的解放做出發點，並非從什麼階級做出發點，他們的那種顧忌也並不致妨礙我們的任務。又例如他們最怕是擾亂香港的治安，動搖他們在香港的統治；這在我們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最大敵人和極力主張全國團結禦侮的時候，也用不着就和香港的統治者爲難，所以也不妨礙我們。

此外，在那個地方，我們却得到一個有利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對於日本的畏懼心理，並不像其他地方的誠惶誠恐，搖尾乞憐得不像人樣！我們對於抗敵救國的主張和敵人侵略我們的消息，都還可以登得出來。這個特點實給與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辦報的一種很大的便利。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做中國人的人要在這個地方才有這樣的權利，說來當然是可爲痛哭流涕的。有人說香港是殖民地，中國是半殖民地，誰料得到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還比不上殖民地！

最後還有一個要點，有些人也視爲莫大的便利，在生活日報却無意利用它因爲在事實上沒有利用它的必要。這個特點是這樣：假使中國有甲派和乙派做對頭，甲派要打倒乙派，（

或乙派要打倒甲派，那甲派在香港辦的報可盡量醜詆乙派，攻擊乙派，打倒乙派可是生活日報是無黨無派的報紙，它無意擁護那一派，打倒那一派，它只主張全國各黨各派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應該大家拋棄舊仇宿怨，一致團結起來救國。它所要亦誠擁護的是中華民族，它所要打倒的是做着全國公敵的漢奸。

還有一句公道話我應該說的，香港檢查處的職員都是中國人，他們多少還有些民族意識，凡是關於抗敵救國的言論和消息，他們都還肯盡可能地通過。關於民族敵人侵略我國家和蹂躪我同胞的事實，他們也都還肯盡可能地放鬆。

廣東在陳濟棠氏當權的時代，對於新聞檢查也是很苛的，廣東的報紙對於廣東的政聞是不敢依事實報道的，結果是在廣東的人民不信任本地報紙的報道，要知道廣東的真實消息，要在香港的報紙上去看。這當然是很不幸的現象，但是在壓迫言論界的當局並不肯想到這一點：在壓迫下的言論界失却一般人民的信任心，反而增加民衆對於當局的懷疑。那時廣東人要知道真確的『粵聞』，不信廣東報而信香港報，便表示當時廣東當局的信用破產！不能

在內政外交的事實上取得人民的信任，要想專在壓迫言論界來獲得人民的信任，這是合於一句老話，叫做『南轅而北轍』，埋頭苦幹着天地間至愚極蠢的事情而不自知！

香港這個地點實在不宜於以全中國為對象的報紙，這方面的理由，我在後面要談到；不過講到該處的檢查束縛——當然仍是不合理的束縛——確比中國各處好些。這只要看了上面的解釋，便明白了。有些朋友不明白這裏面的情形，說離開半殖民地跑到殖民地去辦報，不知道殖民地的言論不自由當然要比半殖民地還要厲害。其實也不盡然。

七

我們在香港辦報，因為當地的新聞檢查有他們的特點，我們還不感覺得怎樣大的妨礙，至少和『半殖民地』的情形比較起來，我們還可以多說幾句話，多得到一點言論自由，多登出一點真確的消息。我們毫無意思要歌頌殖民地的新聞檢查制度，尤其看到他們對於西文的報紙不檢查，專對中文的報紙為難更顯出不公平；至於我們立於報人的立場，根本反對新聞檢查制度，那是不消說的。不過我們看到『半殖民地』比殖民地更不如，却不勝其慨歎！

我們在香港尤其感到困難的却是印刷業的落後。我們雖未曾普遍調查，但是想到承印我們日報的那家印刷所的工作情形，至今還忘記不了那種麻煩！那裏是用包工制的，我們很鄭重地和工頭約法三章，什麼時候交稿，什麼時候看校，什麼時候拆版……他都一一答應，但是每次都不按照所規定的時間；報紙應該可以在早晨六點鐘出版的，他們往往替你延展到八點鐘，九點鐘！屢次交涉，屢次無效。編輯先生慘淡經營地把新聞這樣排，那樣排，排得自己認為可以了，第二天早晨翻開報來一看，他排在那裏的，現在却發現在這裏大搬其場！有的時候在當夜就被編輯先生發覺，叫他們照規定的樣子排過，他們憤然很不客氣地說：『你就拿出一萬塊錢來，我們還是不改！』我們和他們講理，他們說：『我們香港的工人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工人頂括括，我們是比不上他們的。』

校樣上的錯字，校對先生改正之後拿去，他們隨意替你改排幾處，隨意替你留下幾處不改，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校對先生在二校上又一一改正，他們又這樣『隨意』之後，再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所以校對先生『埋頭苦幹』了三校四校，還是東一個錯，西

一個錯。真是所謂焦頭爛額！有一天前進一欄裏有一篇文章，校樣裏缺了許多字填着許多黑而且粗的雙槓在空字地位，第二天早晨原樣印出，使人硬着頭皮讀下去都不懂。該欄編者柳湜先生在留別南中國朋友那篇短文裏，所謂『錯字，缺字，更弄得編者掉淚，作家痛心！』的確不是無病呻吟，確能反映我們當時的憤慨心理。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有一期上有個啓事，劈頭是『生活日報自二十五年八月一日起，遷移下海，』我們要搬回上海，他們却一定要請你『下海』

你在香港出版的各日報上，往往可在大標題裏面忽然看到鑲着一個小小的字體！尤其可笑的是缺少『懂』字，就印上『董』字，下面加個括弧註道：『加心旁』或一時找不着『鍾』字，就隨便印上『產』字，下面加個括弧註道：『加金旁』好像什麼十三經註疏似的！這種獨出心裁的新奇花樣，是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所夢想不到的。你要用方頭字的地方，他們替你夾入一兩個普通鉛字；你要用普通鉛字的地方，他們却替你夾入一兩個方頭字進去！

種種尷尬，我們和工頭交涉，他總是很慷慨地給我們以空頭支票，於是我們不得不和那

個公司的經理先生麻煩。我往往在半夜三更，或天剛剛亮的時候，打電話去和他噙噉，爭些很客氣地樣樣答應，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糟！

我們弄得沒有辦法！自己沒有印機，要掉換一家印，根本就沒有！我們起初也不知道印刷工友們爲什麼那樣不講理，後來仔細打聽，才知道工友們在那樣嚴酷榨取之下，失却他們的理性，却也是可以原諒的。他們每天要做十六七小時的工！每夜要幹到深夜四五點鐘，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十一點即開工，一兩小時後吃午飯，飯後繼續幹着，下午五點鐘晚飯，晚飯後就一直又要幹到四點鐘。睡的時候就隨便七橫八豎地躺在鉛字架下面睡，吃時也在那裏。（每月工資最多的是二十四元。）這樣一天到晚昏天黑地做着苦工，怎怪他們一看見稿件來就開口罵你幾句；你還要講究這樣改良那樣，當然要被他們痛罵一頓。聽說那個工頭不但擅長於榨取，而且慣於剋扣工資，有好幾個姘頭，吸上鴉片烟癮。我們屢次要求工頭改善那些工人的生活，他的堅決的回答是：『香港的工人都是這樣的！』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就是聽我們談起這些工人的情形才寫的，什麼『做了八點鐘，再做八點鐘，

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又說，「機器冬冬冬。耳朵嗡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確是紀實之作。（這詩被香港的新聞檢查處抽去，在他們不能不算是聰明的。）

我們幾於每天要和印刷所爭吵，這是在印刷方面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麻煩，大概的情形，我在上次已和諸君談過了。印刷這件事雖是麻煩，但是經我們繼續不斷的交涉，不但和工頭鏗而不捨地爭吵着，不但時常於半夜三更打雷話給印刷所經理先生，鬧得他不得好睡，並且由我自己先問清工頭，開好排字房的工作時間表，裏面載明幾點幾分鐘交什麼版的新聞，幾點幾分鐘要排好什麼版的新聞，幾點幾分鐘要拆什麼版……先給工頭親眼看過，他沒有異議後，我便從晚飯後親自捧着這個時間表到印刷工場裏去「坐鎮」，徹宵不睡地看着他們做。本來他們是很撤爛污的，編輯室的稿子儘管送來，他們慢吞吞地像和兔子競走的龜，隨意把多下來的稿子擱在一旁，置之不聞不問之列。我用蠻幹的辦法，一看見有一張稿子送來，

立刻就查看有沒有人排，如果沒有人立刻接排，就對了頭提出質問，要他重新支配工作；如果人手不夠，便立刻和他吵，逼他立刻加人。每到時間表上的時到了，我便要他交出那個時候應該拚好的那一版；他交不出來，我就跳起腳來和他吵。時間表上所列的時間是根據他嘴裏說出來的，他無法抵賴，雖不願意『仰頭樂幹』，也不得不稍稍『埋頭苦幹』一下。工友們看着我那樣一點不放鬆地用足勁兒，居然引起他們的笑容和興趣，增加些他們的效率。『坐鎮』到版子鑄好上機，然後放心踏出印刷所的門口，東方已放射出魚肚白了。我在筋疲力盡中好像和什麼人吵了一夜的架！

這樣的印刷所，我想一定打破了世界的紀錄！我暗中把它比做一隻大笨牛，我們在後邊用手推着這隻大笨牛走，出了全身的大汗，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用大聲呼喊著，聲嘶力竭，才把牠稍稍推動了一些。在諸君想來也許要怪我們自己也笨，既覺得這樣一個打破世界紀錄的印刷所不行，爲什麼不掉換一個印刷所試試看呢？這話實際等於飢荒勸人吃肉糜！在香港你根本找不到另一家可以替你承印日報的印刷所。香港印刷業的落後，我到香港就調查過，原

來知道的所以我最初並無意在最近期內就開辦日報。但是後來聽到有個印刷所，從德國買來一架簇簇新的頂括括的一九三五年式的捲筒印刷機，答應承印我們的報，誰也料不到竟至搖身一變而成了一隻大笨牛！其實印刷機的確不壞，毛病全在排字房。這事要根本解決，當然非自辦排字房，鏟除包工制不可，但是這又是錢的問題。要有個設備比較完善的排字房，非有萬金左右的開辦費不可，這在我們這窮小子是無法應付的，所以要末立刻關門，要末只得毅然決然硬着頭皮負起推牛的任務。

推牛和吹牛不同；吹牛怪容易，推牛却夠麻煩。但是麻煩儘管麻煩，總還可以用你的自由意志去推。還有一件困難的事情是我們更無法自主的，那便是在以全國為對象的日報看來，香港的交通實在可說是又一隻大笨牛。我們通常知道由香港開上海的郵船，最快的兩天可以到；至於航空，那就更快，由上海開到廣州，由廣州經火車到香港，隔天就可以到：這似乎不能不算是相當的快。但是實際情形卻沒有這樣順利，因為最快的郵船每月只有一兩次，其餘的船要四五天，五六天，甚至六七天才到。航空的信件嗎？屢次在你所收到的信件上印一個蔚

藍色的戳子上面是“Flight Delayed”（『飛行延擱』）給你一個九天才到！

這種情形，在以西南爲對象的港報，還不感到十分困難，橫豎它們的銷路偏重在西南，它們的新聞也偏重在『粵聞』『港聞』，但是生活日報是以全國爲對象，它的銷路是普遍於全國，它的新聞是以整個的中國做出發點，遇着這樣的另一隻大笨牛，便成了一個大問題。結果，每天在我的辦公桌上高高地堆着一大堆由全國各地讀者的來信，都說他們很要看我們的報，但是到得太慢了，要我們趕緊想法子。我們能怎樣想法子呢？最爽快的法子當然是自買一架飛機，或是自己定造兩隻郵船！但是這樣爽快的法子，在五年十年後的生活日報也許可以說出就幹，可是在香港貧民窟裏辦的生活日報，這句話僅在嘴上提一提，讀者諸位好友們聽了，就已經要感覺到我是在發瘋！

九

平心而論，如只想在香港辦一個地方的報紙，只想以西南爲範圍，生活日報實在還可以

在香港繼續辦下去，但是我們辦生活日報是要以全國爲對象，而且看到每天堆滿桌上的全

國各處讀者的來信都要求『遷地爲良』歉疚的情緒時刻在我們的腦子裏迴旋着同時我們還有擴充股本，增廣規模的大計劃，於是便毅然決然遷移上海來籌備出版。

我一方面在香港完全以自己籌備的一筆款子試辦日報，完全以毫無黨派的民衆的立場辦報，正在排除萬難，埋頭苦幹的時候，一方面却時常聽到不可思議的意圖中傷的謠言。有的朋友告訴我，有人在造謠說我得到南京某鉅公十萬元，以離開上海爲條件，於是就把這筆不清白的款子在香港辦起報來。又有朋友告訴我，有人在造謠說我得到西南的錢，替他們辦機關報。這絕對衝突的謠言竟同時傳到我的耳朵裏，真使我覺得好氣又好笑。正在這樣遭受着莫名其妙之冤曲的當兒，忽然得到老友曾虛白先生的一封誠懇慰問的信：

『韜奮學兄：

連讀賜寄生活日報兩期，異常高興。不客氣的話，從報人技術的眼光來批評，這兩期我實在不敢恭維，並且要說一句太簡單了；可是從朋友的立場說，惟其簡單，可以證明你這份報經濟的並不充裕，間接證明了我在此間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的毫無根據，你還是純潔的，

還是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掙扎苦鬥着就憑着這一點信念我感到非寫幾句去安慰我海南奮鬥的同志不可了。

從你報上接二連三的×××記號上看來，我知道港方檢查壓迫的利害或者更甚於上海，從你們引時事新報『阿國慘敗了教訓』句中，也發現了大批×××記號一點上看來，知道你直接接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我們更要利害。咳！在這時代何處真是言論自由的樂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贊成你在港出版的計劃。

關於你編輯技術上，我有幾點供獻：

(一) 改換字體：你的報是中型報！要在小範圍內容納大量的新聞，所以必用小體字，老五號是不行的，必改用新五號或六號字。

(二) 新聞緊縮：路透電等，應重寫，摘其精華！要言不煩。

(三) 初創時切勿廣拉廣告，徒陷於一般報紙低折扣登大幅廣告同樣之困境，應集全力注意推廣銷路；待銷路有把握，然後創小幅廣告而高價之例，應登者亦可踴躍。

(四) 本報專電似太少。報紙人才應向外發展，編輯部有三四人主持足矣。其他重要人員應分駐各處。

這是我想着的幾點，順筆書此，毫無系統，望恕潦草，此頌。
筆健。

弟制虛白手啓。六月十七日

這一封充滿着誠摯友誼和主持正義的信，好像在我患難中從天上降下來，使我發生很深刻的感動，這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却的一件事。

我在香港常自恨力量微薄，當時生活日報的規模太簡陋，但是不料正惟其簡陋，使造謠中傷者不能盡售其技！

關於香港新聞檢查的情形，我以前曾經談過，凡是有關英國的新聞或言論，檢查得特別嚴厲，因為那裏是完完全全的英國的殖民地；可是關於抗日救國的新聞或言論，却比較地可有相當的自由。

曾先生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他的指教是很可寶貴的。不過在印刷業

那樣落後的香港六號字根本就沒有，新五號字極少所以只有死笨的老五號。我爲着這件事，老早就和工頭開了好幾次的會議，結果是不可能。新聞重寫，我們的計劃中原也有，後來已漸漸的實行了。在香港的生活日報的廣告却一開始就很神氣，據熟悉香港廣告界的朋友說，已和該地原有的銷路最大的日報分庭抗禮了。關於全國的重要通信網，後來也漸漸的精密起來。

此外我在香港所感到的精神上最大的欣慰，是共同努力於報務的幾位共患難的朋友始終不灰心，無論環境怎樣困難，他們總是鼓着勇氣幹着。他們的堅毅的精神，赤誠的義氣，和真摯的友誼是我所永遠不能忘的。我深信我們在這樣掙扎苦鬥中所獲得的極可寶貴的經驗，對於將來重振旗鼓的生活日報是有很大的裨益的。